

# 中國大陸民眾的 民主評價差異與民主支持： 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 / 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

吳心詒\*\*、黃忠偉\*\*\*

## 摘 要

威權國家中的公民為何支持民主？既有的現代化理論、重分配理論或文化層面的解釋，都侷限於一國境內的社會結構變動或歷史遺緒。本文希望將國際因素帶入相關討論，並在「強制」與「競爭」兩種機制之外，提出國際間民主政體的「民主示範效果」，是促使威權大眾希望本國「模仿」民主政體的關鍵因素。此外，基於「軟實力」與「公共外交」的概念，我們認為國際間的民主大國，以及鄰近威權國家的民主政體，將更有機會藉由民主的實踐，刺激威權國家公民對民主的渴望。但同時，我們也認為威權國家中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將弱化民主示範效果對大眾民主支持的影響。

本文以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作為威權政體、民主大國與民主近鄰的案例，藉由分析 2011、2015 與 2019 年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三波民意調查資料，我們發現人們對於美國與中國大陸，以及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民主品質評價差異，將顯著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並降低人們對威權政體的普遍體制支持。同時，我們也發現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將中和美國與臺灣對大眾民主支持帶來的示範效果。

關鍵詞：民主支持、軟實力、愛國主義、民族主義、中國研究

---

\* DOI:10.6166/TJPS.202012\_(86).0002

\*\* 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講師，E-mail: hsinche.wu@nju.edu.cn。

\*\*\*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E-mail: osbern@gmail.com。

收稿日期：109 年 11 月 13 日；通過日期：109 年 12 月 28 日

## 壹、前言

半世紀前，當 Lipset 談論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的關係時，其立論核心在於大眾對民主政體的渴望與支持，將隨著經濟的現代化而出現（Lipset, 1959）。由於民主政體的核心在於「民有、民治、民享」，若人民不願或無能力作主，而更偏好將管治的政治權力賦予既有的威權政體結構時，民主政體絕無可能誕生，即便勉強轉型，也難有鞏固可能。畢竟，民主政體是最需要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一種政體形式（Diamond, 1990），因此在民主化（democratization）的個體理論（micro-level theory）中，民主政體在群眾中有多少支持度，不僅關乎一威權國家民主轉型的可能性，也與新興民主的鞏固息息相關（Claassen, 2020；Foa & Mounk, 2016；Welzel, 2006）。是故，了解威權國家中哪些人更偏好民主政體，原因為何，一直是當代民主研究者長期關心的研究主題。

造成威權國家民眾更嚮往民主政體的因素，主要有現代化理論與重分配理論兩種主流解釋，前者論證現代經濟的發展，將使人們越發追求個人的自我表達，並企求一不受暴君左右的民主社會。後者則明示在專制政體中社經地位較低者，會為追求政治與經濟上的平等，而期待在經濟與政治權利分配上更為公平的民主政體。然而，本文認為，在現代化導致的價值變遷與重分配需求兩種「驅力」（drive）之外，當代民主國家在實踐民主過程中所展現的「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也同樣是誘發威權國家大眾民主支持的重要因素。唯有在當代民主國家的民主實踐受到大眾的認同，且威權國家公民對本國民主程度的低落有清楚認識時，在兩相比較下，民主政體才在威權國家民眾心中變得可欲，令人們產生「大丈夫當如此也」的心態。亦即，高品質的民主國家得以成為大眾心中威權轉型後的發展模板及目標，使人們更渴望自己的國家也能成為「像那樣的」民主政體。

此刻，全球範圍內經濟與實質影響力最大的兩個國家，中國與美國，即分別屬於威權與民主兩大陣營。中國大陸在歷經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後，其經濟發展成就令世人注目，不過在政治發展上，卻未如現代化理論預期一般出現民主轉型。但隨著近年來公民社會的蓬勃發展，多年來學者們對

中國民主化的可能始終抱持希望，也持續關注中國大陸大眾民主支持的漲落與影響因素。而美國則在二戰後成為世界強權，在冷戰時代以民主陣營的領導者自居。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成為全球在經濟、軍事與文化層面上絕無僅有的超級大國，成為國際政治上不可忽視的存在。另一方面，臺灣則不僅是距離中國大陸最近的新興民主政體，更因為長期以來與中國大陸在主權與治權上的爭議，因此並不被中國大陸官方視為「外國」，而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基於臺灣的政治分歧建立在統獨之上，臺灣歷次的選舉結果也總受到中國大陸官民的高度重視。但同時，隨著 2018 年中美貿易戰的開打，以及 2016 年民進黨在臺灣的再次執政，美國與臺灣成為中國大陸愛國與民族主義論述的重要目標。基於美一中一臺關係一直是中國大陸外交領域的核心議題，三者長期有頻繁的互動，因此，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支持，也將更有可能受到對美國與臺灣民主表現評價的影響，同時也受到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調節。本文的研究貢獻，便在於建立以個體層次為分析標的研究假設，並以調查資料實際驗證美國與臺灣對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示範效果，以及愛國與民族主義對上述示範效果的限制。

在接下來的段落中，我們首先將針對威權政體大眾民主支持的研究進行回顧，並提出「民主國家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 of democracies) 對於大眾民主支持將帶來的正面影響，將引領著威權政體中的人們想像在本國中實現自我管治 (self-govern) 的可能。同時我們也將論證「愛國 / 民族主義」(patriotism-nationalism) 如何減弱上述的民主示範效果。本文將以中國大陸、臺灣與美國作為研究對象，並利用 2011 年、2015 年及 2019 年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三波具全國代表性的調查資料，驗證本文的假設。

## 貳、大眾民主支持與民主示範效果

### 一、建構民主支持的解釋說法

人們為何支持民主體制？專制政體中的哪些人更支持民主？這些疑問，一直以來都是比較政治學者關注的議題。傳統上，學界以「現代化理論」(modernization theory) 以及「重分配理論」(theory of redistribution) 來解釋大眾民主支持的起源。自 1950 年代起開始發展的現代化理論強調，在經

濟成長的過程中，爲了符合當代工業社會的持續發展，社會結構必然出現急速變化，使分工變得更精細，資訊流通也變得更自由多元，而在貴族與農民兩大傳統階級之外，更出現了新興的中產階級。這些中產階級雖然掌握經濟資源，但卻沒有相對應的政治權力以保護私有財產，因此尋求一套保障私有財產不受專制政府侵害的民主制度便油然而生（Ansell & Samuels, 2014），而這套新的社會階級體系同時也符合了工業社會對於多元與精細分工的需求（Dahl, 2000）。此外，隨著經濟發展而來的工業化、城市化、通訊與交通方式的革新等，也都大幅地轉變傳統社會的運作邏輯，其中，國民教育體系的出現，使得人們更加掌握實現自我潛能的能力（Boix & Stokes, 2003），並且在社會日趨富裕，溫飽不再成爲第一要務之後，人們將更重加視「個人表達價值」（self-expression values）（Inglehart & Welzel, 2005），此時，傳統威權統治者已經無法滿足社會中的個人因社會變遷而產生的種種外於溫飽或存活的新需求，因此，得以讓一般大眾掌握政治權力，對政治議題表達意見的民主政體，便成爲現代社會公民的第一選擇。現代化不僅僅表現在器物的革新上，同一時候大眾心理層次的價值變遷，特別是「解放價值」（emancipative values）或「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democratic values）的形成（Norris, 2003；Welzel, 2006），更是促使人們更加支持民主體制的重要原因。

相較之下，近二十年來，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導致不平等的背景中，民主化的重分配理論被政治經濟學者重新搬上檯面，強調民主政體的「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特質。基於人的自利以及對經濟分配的感知，當一社會不平等程度越高，其中位選民收入就離平均收入越遠，故該社會中將有絕大多數的民眾會希望藉由對高收入者課以更高的稅率，來達到重分配的效果（Meltzer & Richard, 1981）。因此，由於民主政體的「平等」特質，若社會上的菁英有錢有權，而群眾多數缺錢缺權，此時，無錢無權的群眾將較偏好民主制度，因爲民主使群眾獲得法理權力，使政府必須反映群眾的偏好，採行更多重分配的政策（Acemoglu & Robinson, 2006）。另外，多數學者也從民意調查的分析中發現，在高度不平等的狀況下，所得低者確實會因爲預期有更高的重分配政策而更支持民主政體（Krieckhaus et al., 2014）。簡言之，在威權政體下，低社經地位者將對民主政體有更高的偏好，

而高社經地位者則更願意維繫既有的威權統治。

除了現代化理論與重分配理論之外，傳統文化價值（Chang et al., 2005；Shi, 2014；Shin, 2011）、一國的民主程度（Claassen, 2019b）等，也被認為是能影響大眾民主支持的因素。然而，這些理論雖解釋了人們偏好民主政體的原因，卻並未說明生活在威權政體中的人們，最初如何知道「民主是什麼」以及「民主能做什么」，更未曾考慮到民主轉型雖是發生於一國境內的政治活動，但在當下的全球化時代，由於每個國家都鑲嵌於國際政治體系之中，因此即便是相對在地（domestic）的政治事務，也將或多或少受到其他國家的影響。因此，本研究的目的便是要將國際脈絡的因素再次帶入民主支持相關的討論，並論證現有的民主國家，可以藉由自身的民主實踐達到「示範效果」（demonstration effect），而促使「觀眾」－威權國家中的公民－更加偏好民主的生活方式。

## 二、民主示範效果的理論基礎：模仿、軟實力與公共外交

無論是現代化理論或重分配理論，都隱含了一個假設：無論是為了符合獨立發展的可能、保障私人財產的期望，或是得到更多的經濟利益，「個人需求」（personal needs）是激發人們偏好民主政體形式的關鍵因素。然而，這些理論並未提及人們如何「認知」（conceive）民主這樣一種政體形式，能夠回應並且滿足上述的個人需求。我們當然也不能否認人類的理性計算能力，能夠使我們一步步算計一多元政體的運作結果，也不該忽視人們博覽歷史長河中人類智慧結晶，如由洛克、彌爾或聯邦黨人之言，去理解自由社會的種種可能性。但事實上，大多數人並非由理論演繹、思想實驗，或從抽象的論述中憑空想像民主轉型後的政治生活面貌，而是藉由找到一思考上的「錨點」（anchor），或透過簡單資訊形成的「認知捷徑」（cognitive shortcut）（Weyland, 2012）來判斷民主政體運作的樣貌。由於生活於威權政體下的公民無法由個人的生活經驗中獲得作為錨點的資訊，也難以如你我一般接受政治學相關的高等教育，因此本文認為，國際間民主國家的民主實踐過程及結果，便成為威權國家公民想像民主政體運作模式的主要參考點。

傳統上，國際因素對民主轉型與民主支持影響的討論，可以被區分為

被動與主動兩種形式。被動的形式主要表現於民主轉型的「叢集效應」(clustering)與「鄰近效應」(neighbourhood effect)，例如 1980 年代末期的「蘇東波」，即被認為是一種「擴散」(diffusion)效果，使民主轉型聚集在相鄰或文化相近的地區同時出現 (Brinks & Coppedge, 2006; Houle et al., 2016; Huntington, 1993)。相對於被動的影響，民主國家主動影響威權轉型的機制，則可以被整理為三種主要形式：「強制」(coercion)、「競爭」(competition)與「模仿」(emulation) (Miller, 2016)。「強制」為學界在討論外國或國際勢力對威權轉型影響時著墨最深的機制，例如大國利用各種硬實力壓制民主革命 (Boix & Stokes, 2003)，或以直接侵略方式掃蕩專制政權，強行建立民主政體，或利用經濟封鎖等方式削弱獨裁者實力等「硬實力」(hard power)的介入。「競爭」則指威權國家菁英為了競爭外國直接投資，而採行自由化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政治民主化的結果。「模仿」則是指由於社會與文化價值的改變，使人認為民主是比較合適的制度，而導致的民主轉型。更進一步地，Miller 認為威權國家的「學習機制」(learning mechanism)，即民主國家在經濟發展上的成果，令威權國家菁英與大眾對民主更加嚮往，將增加了民主支持與民主轉型的可能。本文認同學習機制對於民主支持的影響，畢竟在一跨國資訊流動無遠弗屆的時代，人們學習的對象將不受距離遠近的限制，而民主支持的培養也確實應由「模仿」形成。但本文認為，這不僅僅是為了經濟發展的理性利益計算，而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模仿與學習過程。

個人對於政治制度的選擇，正如同我們的生活與成長一般，對於可參考模範的「模仿」是不可避免也不可或缺的重要過程。從嬰兒時期起，模仿便是我們學習語言 (Snow, 1981) 與認知發展的重要行為 (Meltzoff, 1988a; 1988b)，而幼年期的模仿行為是照單全收式的，例如電視節目便對嬰幼兒的模仿行為有強烈的影響 (Meltzoff, 1988a)。此外，心理學上的社會學習理論 (social learning theory) 也將模仿以及模仿的後果，視為是強化人類學習的主要方式。簡言之，在人類成長過程中，總會對各種事物進行模仿，而當我們所模仿的事物令我們得到正面的回饋時，或是當我們看到被模仿者的正面影響時，我們會強化該類模仿，以期待得到更多正面回饋。反之，若該模仿使我們受到懲罰，或使被模仿者得到不良的後果，則我們

會記取教訓。因此，模仿同時也是與同儕互動的過程，例如在青少年之間，同儕的社會比較與對影視名人的模仿會相互影響，更進一步增加人們的購買欲望（Chan & Prendergast, 2008）。因此我們可以說，藉由比較的結果而決定模仿的對象，是人類天生的學習機制之一。

基於民主政體並不僅有「經濟成長」這個好處，還有政治繼承穩定、維繫和平，以及使公民得以發揮潛能等優勢（Dahl, 2000），使得民主作為一種良善政體的形象，將有機會沿著訊息的跨國傳遞，為資訊較為開放的威權國家民眾所知。當人們得到民主國家政治運作的相關資訊，如民主國家中人民的生活水平、政治參與程度、個人自由與財產所受到的保障、集會結社與言論出版自由，甚至是競選過程與開票之夜等等資訊時，在「比較」的過程中，將會認為自己所處國家的政治制度，若也能如同這些民主國家一般運作，將更有利於自身生活的需求，也更符合心中對於政治制度的期待。當資訊的跨境流動已是家常便飯，當民主革命的火種點燃，便容易形成群眾模仿效應。也因為人們能夠參考他國民主轉型的方式與民主制度的實際運行，大眾便能夠尋求一個「最佳典範」（best practice）作為自身政治轉型的參考點（O'Donnell et al., 1986），試圖模仿某些國家的政治運作，以達到相同的民主實踐結果（Silva, 1991）。我們認為，當人們對其他國家的民主表現給出高評價時，人們便更有模仿該國政治制度形式的欲望，而降低人們對於本國當下專制體制的支持，轉而支持民主體制。

然而，並非所有國家都能成為大眾眼中的「民主模範」（democratic model）。正如人們的模仿行為一般，受限於人類的感官經驗，人們僅能從可被察覺到的他國經驗去了解一國的民主表現，也唯有如此，人們才得以對這些國家的民主做出評價。由於對絕大多數平民而言，要能對國際事務瞭若指掌並非易事（Hollander, 1997；Soroka et al., 2013），更何況是遠在天邊的各國民主表現。因此，若一國的民主實踐要為其他威權國家公民有所感受，且導向大眾的民主支持，其微觀機制，便必然與一國的「軟實力」（soft power）高度相關。

軟實力相對於硬實力，即為利用非暴力的方式影響他人，使他人也想要你所期望的結果（Nye, 2008），故軟實力便與能型塑人們偏好的能力相關。軟實力的效果並不僅表現在經由辯論來說服他人，更是一種誘惑（entice）

與吸引 (attract) 的過程。因此，唯有擁有吸引他人的能力與資源，才具有施展軟實力的空間。而在國際關係的層次上，能夠產生軟實力的資源來自一組織或國家在表現其文化的過程中展現的價值，同時，Nye 更提到內部實踐與政策 (internal practices & policies) 以及與他國互動過程在產生軟實力資源上的重要性 (2008)。另一方面，「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 則是政府動員軟實力資源以吸引他國民眾的工具，例如遍布全球的廣播網路、對本國文化出口的補貼等，但這並不代表使用公共外交的手段就能影響他國民眾，而必須建立在該國的文化、價值與政策足夠吸引他人的前提下。

因此，就政治傳播的角度而言，「在國際事務上能見度最高的國家」，以及「與國內事務高度相關的鄰邦」，才有機會將自身的資訊，藉由特定渠道傳達至他國公民，並透過影響公眾輿論的方式，達到政治上的目標。而基於「公共外交」的概念，唯有強大穩定的民主國家，以及與威權政體共享同一文化的民主近鄰，才擁有足夠的政策資源與特定的政治價值，得以藉由適當且有魅力的文化載體，建構出自身的政治軟實力，以影響他國民眾的日常生活，甚至影響人們的價值與思考體系 (Nye, 1990 ; 2008)。是故，我們認為民主「大國」與「近鄰」將提供給威權國家大眾最多的民主示範效果，而威權大眾對這些國家的民主評價，便是人們評估本國政治表現的參考點，同時也作為人們理想中民主政體的模板，並正面增強大眾的民主支持。以下，我們將以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分別作為威權國家、民主大國與民主近鄰的實例，並以美國與臺灣對中國大陸民眾可能施展的軟實力為出發點，進一步建構民主示範效果的理論與假設。

### 三、民主示範效果的案例解析：以美國、臺灣與中國大陸為例

在當今諸多威權國家之中，其民主化前景對世界影響最甚者，莫過於中國大陸。歷經了 40 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陸實現了令世人驚豔的經濟發展，直到 2018 年，其人均國民生產總值 (GDP per capita) 已達到 9,770 美元之譜，早已高於 Przeworski 與 Limongi 所提出的「民主轉型區」(transition zone) (Boix & Stokes, 2003 ; Przeworski & Limongi, 1997)，也就是說，若簡化的現代化理論－經濟發展程度與成為民主國家機率成正比一言之成理，則中國大陸早已轉型，進入民主國家之林。然而，在 2012 年



進入「習時代」後，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威權政體不僅沒有絲毫鬆動的跡象，反而更加強化國家對公民社會的控制（Qiang, 2019），同時也不斷加強在國際社會的聲量，試圖以「威權推動經濟增長」的「北京模式」、「中國模式」來與西方民主進行抗衡，使中國大陸不僅成為 21 世紀非民主陣營的旗手，更成為民主陣營的潛在大敵（Diamond, 2019）。但在此同時，在中國大陸境內，無論在不同年份，由不同單位所進行的民意調查都指出，中國民眾對於共產黨政權的支持程度一直維持在高水平，顯示人們對於共產黨領導的專制政體的支持，並未因經濟增長的放緩或言論自由空間的收緊而減弱（Lu & Dickson, 2020）。基於中國大陸「崛起中的威權大國」角色，因此，哪些因素會使得中國民眾更加支持民主，或是反對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一直是民主學界的研究熱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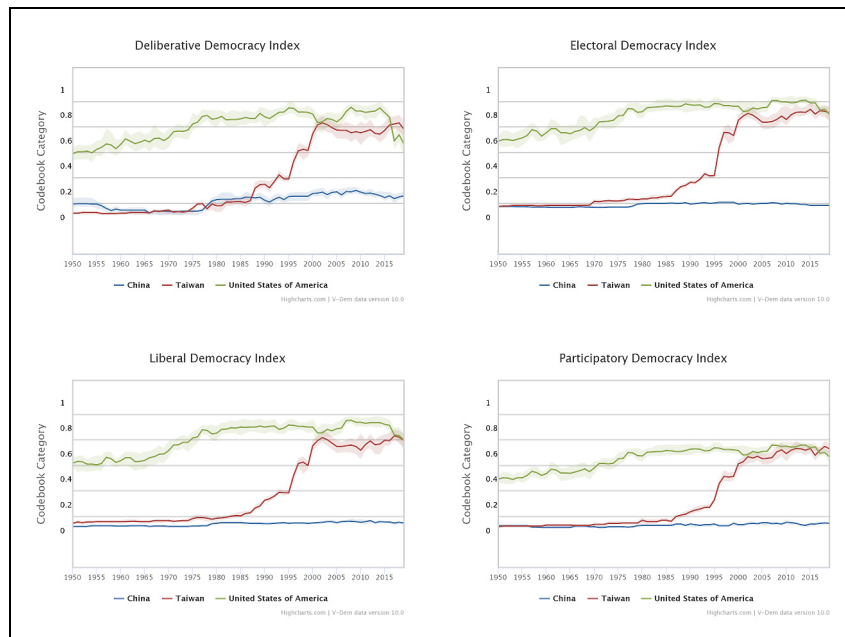
光譜的另一端，在當下所有民主國家之中，對激發其他國家的民主轉型最甚者，莫過於美國。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革命作為全球第一場共和革命，雖然影響力並不若後發的法國大革命，但美國立憲民主的開創性，雖然並未直接影響 19 世紀歐陸以及南美洲的民主轉型，但也確實為後進的民主國家提供了在轉型過程與制度建立上可參考的先例（Von Beyme, 1987），特別是在 19 世紀的拉丁美洲獨立革命過程中（Silva, 1991），扮演了意識形態火車頭的角色。而進入 20 世紀，在兩次大戰之後，美國強大的經濟與軍事實力，以及在全球流行文化與大眾傳媒上的領導角色，都使得世界各國，無論菁英或大眾，均以美國為瞻（Sylvan, 2017），這正是美國強大軟實力的證明（Nye, 1990），亦即，當人們見到美國的民主、自由與繁榮、進步時，人們必對其折服，並心嚮往之。二戰之後，美國軟實力對於民主轉型的推進效果，首先可見於 1970 年代西班牙與葡萄牙的民主轉型過程中，美國境外廣播系統對威權國家公民層次的鼓動與說服（Cull & Jiménez, 2015）。而到了冷戰末期，美國藉由媒體、非政府組織與國際組織三管齊下，對蘇東國家所施展的強大宣傳能力，使得多數鐵幕後的民眾嚮往鐵幕之外，而間接導致蘇聯的迅速土崩瓦解。以上案例，正是美國的強大軟實力，藉由公共外交的政策工具引發民主轉型的成功範例（Nye, 2008）。因此，自由女神的形象出現在北京的廣場與香港的街頭以作為民主集會的象徵，或美國國旗現蹤於東歐顏色革命及港島的示威現場，也就不令人感到

意外。我們認為，對全球多數的威權國家而言，美國的民主表現都將最有機會產生示範的作用。

另一方面，隔著一灣海峽，臺灣是對於中國大陸民眾而言，另一重要的跨境資訊來源。相較於鄰近中國的其他東亞民主國家，由於語言、民族與文化上的共通性，及兩岸歷史的關聯性，臺灣的經濟發展與民主轉型過程，常成為學界與中國大陸進行比較的基準點（Dickson, 1998；Gilley & Diamond, 2008）。此外，臺灣長期以來被共產黨政府視為是完整中國的一部分，兩岸統一更是長期的政策目標，因此，臺灣政情的發展，以及臺灣民主轉型後的多次選舉與政黨輪替過程，也較易見諸於各大媒體，並成為中國大陸輿論熱議的話題。而在政治領域之外，臺灣的娛樂與媒體事業，也早在改革開放之後即進入中國大陸，成為人們茶餘飯後消遣時光的重要媒介（Gold, 1993），隨著娛樂的「名人化」（celebritization），中國大陸民眾更有機會藉由閱聽臺灣出身的影視名人，而對臺灣有更多關注（Leung et al., 2013），因此，我們認為臺灣有足夠的文化軟實力，得以影響中國大陸民眾的看法。更重要的是，自 2008 年馬英九總統執政時期起，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緊張情勢急速緩和，除了全面三通（通商、通郵、通航）之外，兩岸交流往來更重要的轉捩點，則在於 2008 年的開放陸客來臺。從此之後，中國大陸民眾有機會登上臺灣土地，直接與臺灣民眾接觸，當然也更有機會親身體會臺灣活躍的民主政治，並修正在兩岸對峙時期所累積的，建立在政治宣傳上對彼此的錯誤理解（Pan et al., 2017）。所以我們認為，相較於周遭的民主政體如日本、南韓以及蒙古，臺灣的民主實踐對中國大陸公民有更強的示範效果。

此外，選擇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三地的民主表現作為範例，還有一層實際的考量。從基於以區域及特定國家專家意見為主要評分標準而形成的全球民主評價資料庫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民主表現評分中，在參與（participatory）、選舉（electoral）、自由（liberty）、平等（egalitarian）四個民主層面上，美國與臺灣在表現上相當接近，但中國大陸的表現則與另兩者相去甚遠。如圖 1 顯示，若以 0~10 分的評分標準來看，美國與臺灣在各層面的表現均在 7 分以上，相較之下，中國大陸在各層面的評分均僅有 1 分左右（Coppedge et al., 2020），也就是說，以西方政治學界的角度

圖 1 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的 V-dem 民主評分 (1950-2019)



資料來源：Coppedge et al. (2020)

而言，相較於身處全球民主前段班，甚至是領導者的美國與臺灣，中國大陸則處於全球民主的後段班，而且是遠遠落後。V-dem 的評分給了我們一個比較的基準，即美國與臺灣相對於中國大陸，在民主的表現上要比中國大陸高非常多，因此，美國與臺灣在民主表現上相較於中國大陸所展現的巨大差距，若能確實為中國大陸的大眾所感知，則在強烈的比較結果下，更有可能激發大眾的憧憬與模仿，並對中國大陸的公民展現出「民主示範效果」，因而導向對民主的認同與對既有專制政體的負面感受。

假設 1a：對美國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民主支持程度越高

假設 1b：對臺灣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民主支持程度越高

此外，除了顯性的民主支持之外，在「威權—民主」二分的概念下，我們也可視人們對於現有威權政治體制的支持程度為民主支持的反指標。更

重要的是，若人們在支持民主體制的同時，卻認為當下的威權體制表現優異，值得人們擁護，則民主支持便失去了向威權政體施壓以及促進威權轉型的可能價值。而在一探討中國大陸中產階級民主支持的研究中也發現，在中國大陸的威權體制現實下，人們對民主運作核心價值的支持，正是對當下非民主的威權體制支持的反面(Chen & Dickson, 2008)，因此反對既有威權政體的程度，可視為大眾民主支持的指標之一。是故，我們在此也同時假定較高的民主評價差異，將降低人們對當下威權政體的認同。

假設 1c：對美國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對本國政治體制的支持越低

假設 1d：對臺灣的民主評價與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差距越大，對本國政治體制的支持越低

然而，威權國家領導者，特別是如中國大陸這樣的崛起威權大國政治菁英而言，對上述的民主示範效果絕非一籌莫展。威權統治者若有足夠能力，則可以限制外國資訊在境內的流通，也可以藉由散佈「虛假訊息」(misinformation)，將民主國家醜化為混亂而失序的國度，此即「無知即力量」對威權統治者的意義。除了限制資訊之外，針對民主政體的示範效果，威權統治者的另一策略，便是竭盡所能增強民眾對本國的信心，以看低甚至仇視外國的一切。正如同過高的自尊與自傲會避免我們修正與檢討自己，向更好的模範學習一般，我們認為，中國大陸民眾間所瀰漫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與「民族主義」(nationalism)情緒，將削弱我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

#### 四、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負向調節作用

在上一節中，我們闡述了民主國家如何藉由完善自身的民主來影響威權國家的大眾民主支持，並以美國、臺灣與中國大陸作為範例。但同時，由於驅動示範效果的「本國與外國的民主程度差異」，本身可被視為一種「民眾對外國的看法」，因此，除了我們在上一節所提出的威權政府對民主國家的宣傳效果外，本節將檢視最可能減弱評價差異促民主效果，以及直接影響民主與體制支持的重要因素：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就定義上來說，

愛國主義指的是對母國感到驕傲，強調情感上的連結與依附 (attachment)，相較之下，民族主義則更進一步地強調母國的「優越性」(superiority)，並應該有主宰他國的能力。傳統上，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多被視為同一概念的不同面向，但也有學者基於主成份分析法的分析結果，認為該將兩者視為兩組特定的概念 (Kosterman & Feshbach, 1989)。<sup>1</sup> 而在一以中國大陸學生為受試者的研究中則發現，愛國主義顯著地影響個人的國際事務觀點，但與民族主義者相比則較為溫和，且願意讓中國納入國際體系。相較之下，民族主義者則有顯著的反國際主義傾向，且對國際事務的觀點更為強烈 (Sinkkonen, 2013)。

在威權政體中，時常存在將威權體制本身與國家掛勾，將體制等同於國家，並利用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來加強體制正當性的舉動。冷戰期間，蘇聯與南斯拉夫便是以愛國主義包裝共產主義制度，並藉此壓抑國內紛陳的族群差異。而在中國，民族主義常被用以當作對抗國際譴責，以及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宣傳工具 (He & Guo, 2000)，也是維繫統治正當性的利器 (Alagappa, 1995; Tsang, 2009; Weiss, 2014)。自 19 世紀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便被用以喚醒「民族意識」，以增強人們的國家認同。而在新中國建立之後，民族主義便被中國共產黨用作維護體制正當性的工具，藉由對民族主義文化符碼與詮釋的控制，共產黨得以將黨與國捆綁起來，將愛黨的元素包裝進愛國主義之中，使民族主義為執政者所用，將民主運動渲染為西方的對華陰謀，並且藉由「恐嚇戰術」(scare tactic) 來加強「以黨為中心的民族主義」(party-centred nationalism)，在「亡黨亡國」的口號下，維繫一黨集權的合法性權威。此外，中國民族主義相關的論述中，總是以歷史、種族與文化，作為高度強調集體主義的必要因素，因此也就更難以忍受各種形式的多元主義與政治異見，而這兩者都是活躍的民主政體所不可或缺的 (He & Guo, 2000)。

因此，基於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長期被中國大陸官方作為培養體制正

---

<sup>1</sup> 關於是否要將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視為同一或不同面向的概念，由於本文使用之調查問卷題目內容與引述文獻並不一致，且在既有的研究中，並未對是否將民族與愛國主義合併或分開處理有一致的處理方式。因此，為求操作上的精確性，作者在此利用面向性測試的結果來決定如何建構愛國與民族主義的相關指標。詳細內容請見本文第參之二節。

當性的政策工具，以及作為反西方式民主轉型的主要論述，我們預期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將直接提昇人們的體制支持，並降低大眾民主支持程度。另外，我們也預期在高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下，即便人們能夠指出本國的民主程度不如其他民主國家，但該現實將不影響個人對既有威權體制的支持，也就是說，我們預期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將改變民主評價差異影響民主支持的彈性，人們也就較不會受到其他國家民主實踐的影響，而持續堅定地支持本國既有的政治體制。此時，愛國與民族主義將「負向調節」(attenuate) 民主國家對民主支持的示範效果。

假設 2a：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支持程度越低

假設 2b：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對本國政治體制的支持越高

假設 3a：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評價差異對民主支持的影響越低

假設 3b：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情緒越高，民主評價差異對本國政治體制支持的影響越低

我們在前兩節論述了「民主示範效果」的作用機制，以及「愛國／民族主義」如何弱化該效果。接著，我們將利用 2011、2015 年與 2019 年所進行的三波全國性調查資料，驗證本文上述的論點。

## 參、資料與實證結果

### 一、研究資料

本文用以驗證假設的研究資料來自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Asian Barometer Survey, ABS) (Chu et al., 2020) 的中國大陸調查子計畫。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為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 (Global Barometer Survey) 的一部分，是目前東亞地區規模最大的長期跨國調查，包含 14 個東亞國家。該調查不僅測量重要的民主指標，如民主支持、民主滿意 (satisfaction to democracy)、對政權的態度與民主評價表現等，同時也包含如政治信任 (political trust)、媒體使用 (media use)、社會資本 (social capital)、傳統價值、政治參與、

社會不平等與國際關係等相關題組。此外，該計畫的中國大陸子計畫是少數長期在中國大陸所進行的跨國調查計畫，自 2001 年的第一波調查以來，每一波調查均涵蓋全中國大陸各省市（不包含新疆與西藏），並於各省市中依據三階段 PPS (proportional to size) 抽樣隨機抽取 125 個區縣級單位，而在區縣單位下，則以戶籍資料與地理抽樣方式進行調查樣本選取，已達到全中國大陸（不含新疆與西藏）的樣本代表性，並且也依照中國大陸人口普查資訊進行事後加權。本研究使用的資料為分別在 2011 年、2015 與 2019 年所進行的三波調查，樣本數分別為 3472、4010 與 4928，並使用在三波調查中文字敘述完全相同的題目，以維持分析結果的穩固性 (robustness)。

使用該調查資料作為驗證本文假設的主要資料來源，不僅僅是因為該資料對中國大陸民意的覆蓋率，還有另外兩個因素。首先，本文主要的研究依變數為「民主支持」，然而在目前的民主研究領域中，有高達 37 種不同的問卷項目，9 類形成問卷項目的途徑，以測量大眾民主支持 (Claassen, 2019a)，其中，在所有能用來測量中國民眾民主支持程度的調查資料中，ABS 包含了最多的類別，<sup>2</sup> 包含了直接提及「民主」<sup>3</sup> 兩字的問卷項目以及不包含「民主」兩字的問卷項目。<sup>4</sup> 因此，該調查被廣泛使用於東亞民主的相關研究 (Chan & Chan, 2014; Chang et al., 2005; Chen & Lu, 2011; Chu & Huang, 2010; Chu, 2013b; Hu, 2018; Huang et al., 2013; Lu & Dickson, 2020; Shi, 2014; Shin, 2011; Tang et al., 2009; Wang, 2007; Zhai, 2018)，以及國際的民主比較研究上 (Claassen, 2019a; Diamond, 2009; 2019; Nathan, 2020; Wu & Chang, 2019)。

其次，由於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大陸，作者亦考量了不同調查資料於中國研究領域中的應用，特別是中國研究與民主研究之間的交集。而多年以來，ABS 的調查資料被用於不同面向的研究之中，包含測量中國民眾

<sup>2</sup> 參見前引 (Claassen, 2019a) 一文中的 Table 2。

<sup>3</sup> 這類項目包含「三選一」項目 (three statement)、民主期望程度 (desirability of democracy) 以及本國的民主合適程度 (suitability of democracy)。

<sup>4</sup> 這類項目則包含本文所使用的「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 democratic values) 以及「接受威權統治形式」(support for authoritarian alternatives) 等指標。關於如何在 ABS 中建構這些民主支持指標，請參考 Chu (2013a)。

的民主支持 (Wang, 2007; Wu et al., 2017)、驗證傳統價值與民主支持的關聯性 (Chang et al., 2005; Shi, 2014)、區別體制支持的性質 (Lu & Dickson, 2020)、探索中國民眾對民主的理解 (Hu, 2018)，以及測量政治信任的變動 (Wu et al., 2019) 等。因此，基於該資料在中國研究與民主研究領域中均被廣泛地使用，並得到豐富的學術產出，作者認為該資料相當適合作為本文的主要研究材料。

然而，幾乎所有在威權國家境內所進行的調查均面臨相同的挑戰，即人們是否能夠在調查過程中誠實作答，而非在威權政體的政治壓力下，對政治敏感的題目給出政治正確的答案，或選擇不作答。不過，針對中國大陸民眾在回答民意調查時是否會對政治敏感議題做出偏誤的回應，有學者利用調查實驗 (survey experiment) 的方法證實，中國大陸民眾並不會因為調查者的身份而改變回答的模式，也不會對政治敏感的議題放棄回答，反而是政治知識的水平決定了人們的回答模式 (Lei & Lu, 2017)。因此，作者認為即便民主支持相關議題在中國大陸境內有政治敏感的可能，但並不影響該調查項目的信度。

最後，作者之所以使用時間跨度幾乎長達十年的三次調查資料，而不是僅採用最近的一次調查進行分析，原因在於自 2011 年開始至 2019 年，中國大陸本身內部的政治情勢，以及美、中、臺三邊關係，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變。在 2011 年夏天時，中美關係與兩岸關係相對穩定，美國總統歐巴馬尚未提出「重返亞洲」(pivot to Asia) 戰略，而臺灣也仍在馬英九總統的第一個任期，兩岸經貿與民間旅遊交流頻繁，可以說是美中臺三邊關係最穩定的時刻。而在 2015 年時，中國已經進入習近平時代，美中關係也隨著貿易爭議與南海問題出現些許波折，在兩岸關係上，雖然 2015 年末的馬習會被視為半世紀以來兩岸關係最重要的突破之一，但隨著 2014 年的太陽花退回服貿事件，以及民進黨在地方選舉上所展現的強大氣勢，兩岸關係已經蒙上了陰影。時間再到 2019 年，中美已進入川普總統主導的貿易戰中，川普總統更利用臺灣問題對中國大陸不斷施壓。而同時，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也已於 2018 年取消了任期限制，鞏固了以自身為核心的統治結構，並在兩岸關係上採取更為強硬的態度，來應對採取親美遠中路線的蔡英文政府。相較於 2011 年與 2015 年，2019 年的美中臺三邊關係相對惡劣



許多，而中國內部的政治也更為高壓，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也最為強烈（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0）。因此，若利用 2011 年、2015 年與 2019 的三次調查資料所進行的分析，均能驗證本文的假設，那麼我們便能確保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 / 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並不因美中臺三邊關係的惡化，或是中國內部政治的威權化而受到影響。

## 二、研究變數

正如我們在前文所提到的，正是因為理解到美國或臺灣與中國大陸民主表現的差距，美國與臺灣才得以作為民主政體的模範，展現對民主支持的示範效果。因此，我們在此以「民主評價差值指數」（differential index of assessed democratic quality），即受訪者對一地區民主程度的評價分數及本國民主評價分數之間的差異，作為本文之研究自變數。該指數的操作化即為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美國與臺灣的民主程度評價兩兩相減而得。<sup>5</sup>

針對研究的主要依變數—「民主支持」，以及相對應的「威權體制支持」程度，我們則分別以「自由民主價值」（liberal democracy values, LDV），以及「普遍體制支持」（diffuse regime support）兩個指標來加以操作化。<sup>6</sup> 傳統上，最常為跨國調查所用以測量一國大眾民主支持程度的題組，為「三選一」題型（Claassen, 2020），即詢問人們民主是否永遠是最好的制度、專制體制有時比較好，或是無法判別兩者的優劣。然而，由於人們對於「民主」概念的認知，在威權與民主國家中有顯著的差異，該題目在威權國家的效度屢屢受到質疑。因此，相較於直接的測量，我們認為間接的測量，例如人們是否信仰自由的價值體系（Linz & Stepan, 1996；Nathan, 2020）、人們對於民主運行模式的理解（Schedler & Sarsfield, 2007），以及對於特定威權體制的反對程度（Foa & Mounk, 2016），更能確切測量威權體制脈絡下公民的民主支持。基於民主體制的多重面向性質，不同的民主政體在民主實踐

<sup>5</sup> 受訪者由 1~10 分中進行選擇，其中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民主；我們同時將無效回答者編碼為中間值 5.5。因此，「美中民主評價差異」變數即為受訪者「對美國民主程度的評價」—「對中國大陸民主程度的評價」，「兩岸民主評價差異」則為「對臺灣民主程度的評價」—「對中國大陸民主程度的評價」。

<sup>6</sup> 各指標所選用的問卷題目，詳見表 1 與表 2，各變數測量值的敘述統計，則列於表 3。

表 1 實證模型各項摘要：各變數所使用的問卷項目(1)

依變數：民主支持
<p><b>體制支持</b>            從長遠來看，我們的政治制度能解決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            整體而言，我以我們的政治制度為榮            即使我們的政治制度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人民也應當支持            與其他國家的政治制度相比，我寧願在我國的政治制度下生活</p>
<p><b>自由民主價值 (LDV)</b>            婦女不應該享有和男性一樣的參與政治的權利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不應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人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            政府的領導人就像大家庭的家長，他們關於國家事務的決定，人民都應該服從            一種意見能否在社會上流傳，應由政府決定            在地方上東一個團體西一個團體，會影響地方的安定與和諧            法院在審判重大案件時，應該接受當地政府的意見            如果政府經常受到立法機構的制約，那就很難辦好大事情            要有道德高尚的領導人，我們就可以讓他們決定一切            大家的想法若不一致，社會就會混亂            當國家面臨困難時，政府為了處理這個困難的情況可以不必理會法律</p>
自變數：民主評價差異
<p>如果 1 代表完全不民主，10 代表完全民主，在程度上，數字越小越不民主，數字越大越民主。            請問您認為：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請問您認為：美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請問您認為：臺灣目前的民主程度            中美民主差異：美國目前的民主程度－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            兩岸民主差異：臺灣目前的民主程度－中國目前的民主程度</p>
調節變數：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
<p><b>民族主義</b>            1.即使可以選擇世界上其他國家，我也更願意做中國公民            2.假如其他國家的人變得更像中國人，世界將更美好            3.總體說來，中國比其他大多數國家都好</p>
<p><b>愛國主義</b>            1.您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自豪嗎？            2.如果您有機會，您願意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嗎？</p>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2 實證模型各項摘要：各變數所使用的問卷項目 (2)

非社會人口學變數的控制變數
<b>中央治理評價</b> 您覺得我國目前以下各方面狀況如何？ （含以下八項，取平均值）經濟增長、環境保護、貧富差距狀況、官員腐敗狀況、就業狀況、食品安全、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中小學教育
<b>地方治理評價</b> 總體而言，您對本地政府在下列各項事務上的工作滿意不滿意？ （含以下五項，取平均值）中小學教育、養老、就業、醫療、住房
<b>經濟表現評價</b> 您覺得我們國家目前整體經濟狀況怎麼樣？
<b>每日閱讀政治新聞</b> 您收聽、收看或閱讀政治方面的新聞嗎？
<b>主觀收入水平</b> 您全家的總收入是否可以支付您家的開銷？
<b>OTA 傳統價值</b> 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仍應該照著去做 婆媳鬧矛盾時，即使婆婆不對，做丈夫的也應該勸妻子聽婆婆的話 作為學生，不應該質疑老師的權威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3 各變數測量值的敘述統計

變 數 名 稱	有效樣本數	均 值	標準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體制支持	12,482	2.93	1.41	0	4
自由民主價值	12,482	4.51	2.45	0	10
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12,482	6.64	1.84	1	10
美國民主評價	12,482	6.02	1.68	1	10
臺灣民主評價	12,482	5.86	1.49	1	10
美中民主評價差異	12,482	-0.61	2.57	-9	9
兩岸民主評價差異	12,482	-0.78	2.29	-9	9
愛國主義（2011）	3,473	1.63	0.59	0	2
愛國 / 民族主義（2015/2019）	9,009	4.13	1.16	0	5
中央政府評價	12,482	0.64	0.33	0	1
地方政府評價	12,482	0.64	0.35	0	1
經濟政策評價	12,482	0.68	0.47	0	1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12,482	0.35	0.48	0	1
主觀收入水平	12,482	1.08	0.75	0	2
OTA 傳統價值	12,482	1.18	1.04	0	3
女性	12,482	0.51	0.51	0	1
教育程度	12,435	2.13	1.12	1	4
世代群體	12,456	1.39	0.66	1	3
農村戶口身份	12,482	0.67	0.47	0	1
黨員身份	12,482	0.21	0.41	0	1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上，也許有不同的運作方式，但政治自由（political freedom）卻是所有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sup>7</sup> 因此我們與學界抱持相同的立場，認為人們對於政治自由的認同程度，將比直接的民主支持題組更能測得大眾對民主體制的偏好。在本文中，我們利用一組十道題目的題組來測量人們對於如政治平等、結社與言論自由、分權制衡以及司法獨立等自由民主核心原則的支持，並以加總回答「同意／非常同意」次數的方式將其操作化，形成一總分為 1~10 分的「自由民主價值指數」指數。另一方面，由於威權大眾對於既有體制的支持恰好處於民主支持的對立面（Chen & Dickson, 2008），因此我們也參考既有研究的變數建構方式，利用對威權政體的「普遍支持」（diffuse support）作為擁護既有體制的操作型定義（Lu & Dickson, 2020），並同樣採取加總在四道題目中回答「同意／非常同意」次數的方式，形成一總分為 1~4 分的「政體普遍支持」指數。<sup>8</sup>

在調節作用變數的部份，我們則利用三項比較本國與他國優劣的子題，與兩項評估國家與國民光榮感的子題，將傾向同意者編碼為 1，並分別加總形成「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指數。然而，針對是否要將愛國與民族主義加以區分，形成不同的兩個變數（Sinkkonen, 2013），或是合併形成一個單一面向的「愛國／民族主義」指標，既有的研究中並未有一致的處理手法。我們在此參考一針對香港民眾愛國主義與自由民主傾向關係的研究，該研究使用與本文使用之調查問題文字完全相同的題組，並藉由面向性測試的確認後，將該部份題組與其他愛國主義題組整併建構為單一研究變數（Chan & Chan, 2014），視為「愛國主義」（patriotism）中「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一部分，而不加以區分。因此，我們在進行變數建構的過程中，

<sup>7</sup> 如同 Dahl 對「多元政體」（polyarchy）所下的經典定義：乾淨的選舉、大眾選舉權、經選舉產生的行政首腦，以及集會結社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多元資訊來源。後三者即均為政治自由面向的定義（1971）。

<sup>8</sup> 對於設計這些題目以及形成題組的立意與理論假設，請參考 Chu (2013a)。而關於如何將不同題組中的題目操作化形成個別因子（factors）並進行迴歸分析，請參考（Huang et al., 2013）一文，其中有十分詳盡的解釋。本文與（Huang et al., 2013）一文不同之處，在於並未利用項目反應理論（Item Response Theory）分數來形成政體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指數，原因在於本文希望在題組信效度已確立的前提下，以更容易使讀者理解操作化方式的形式來進行分析。

也針對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五個變數進行了面向性測試，<sup>9</sup> 以求實證上的精確性。我們發現，在 2015 及 2019 年的資料中，分別代表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情緒的五個項目能很好地形成一個潛在因子，除「有機會也不願意到國外去生活」這個子題之外，每個項目的因素負荷均高於或接近 0.5，且在模型適合度檢驗上也有很好的表現，因此在後續的迴歸分析中，我們將五項子題相加總形成一綜合性的「愛國 / 民族主義指標」，以一併檢視愛國 / 民族主義這個複合情緒的調節作用。

再者，爲了確定民主示範效果並不受其他因素影響，我們也在多元迴歸模型中納入四組控制變數：政府績效評估、傳統文化價值、媒體使用程度以及社會人口學變數 (sociodemographic attributes)。政府績效評估包含中央與地方政府內政績效、經濟表現評價三項。史天健及 Doh Chull Shin 在

表 4 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的面向性測試：  
因素負荷與適合度檢驗

項 目	因素負荷 (2015)	因素負荷 (2019)
民族主義 1	0.644	0.617
民族主義 2	0.528	0.472
民族主義 3	0.665	0.613
愛國主義 1	0.548	0.424
愛國主義 2	0.425	0.306
CFI	0.970	0.943
TLI	0.940	0.886
RMSEA	0.068	0.074
SRMR	0.029	0.034
樣本數	4068	4941
因 子	特徵值 (2015)	特徵值 (2019)
因子 1	1.666	1.305
因子 2	0.344	0.222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sup>9</sup> 此處，我們參考 Huang & Chang (2017) 一文進行面向性測試的方式，利用 Mplus 進行類別 IRT 因子分析，而在模型設定上，則使用驗證性因素分析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我們同時也進行了探索性的因素分析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並同時將各因子特徵值 (eigenvalue) 列出，詳見表 4。另表 4 中各變數的問卷項目，則請見表 1。

談及包含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民主觀念時曾指出：因受儒家文化提倡自上而下「賢能政治」（或稱為「監護式」）治理導向的影響，在談及「民主」概念時，相對於西方民主所強調的程序與權利特徵，東亞社會民眾更優先關注的是經濟福利等民生和治理議題，史天健更提出儒家傳統文化中的「權威傾向」（orientation towards authority, OTA）文化價值，是影響中港臺三地民眾看待民主的核心因素（Shi, 2014；Shin, 2011），另外也有研究指出，儒家價值將直接弱化人們的民主支持（Chang et al., 2005）。以此為基礎，中國共產黨發展並強化了「中國式民主」的概念，以作為「西方式民主」的對立面，既批判性地傳承與吸收了諸如「民本」、「賢能」、「善治」等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也融合和內化了共產黨的相關理念與主張，強調傳統民生問題的解決與對政府優質服務的要求，才是「民主」的要義。因此，我們認為若民眾對政府施政的各方面有高評價，則必然影響人們對於民主制度的支持程度；同時，越傾向傳統權威傾向價值者，也將會有較高的體制支持。其次，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在威權體制下，媒體不僅作為統治集團的傳聲筒，同時也是輿論管制的重要工具，而在中國大陸，基於所有的媒體均「姓黨」，在並無合法非官方管控資訊流通的狀況下，越高的媒體使用量將提昇體制支持及政府信任，也將減低人們獲得外界資訊的可能性。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是否每日閱聽政治方面的新聞也被本文納入作為控制變數之一。

在社會人口學變數的部份，則納入年齡世代差異、<sup>10</sup> 性別、教育程度、鄉村／城市戶口以及共產黨員身份。此外，為了評估「重分配理論」的效果，我們也將「主觀收入水平」（subjective income level）加入迴歸模型中加以控制。

在模型設定上，我們採用 OLS 線性迴歸分析，然而，基於中國大陸的

<sup>10</sup> 本文的年齡世代差異分界主要以改革開放前出生（建國到文革結束世代）、改革開放（1978 年）到 90 後之前（改革開放世代），以及 90 後（1990 年起出生）世代等三個部分。改革開放前出生的民眾，在社會政治環境方面，與改革開放後之後的民眾有著不同的成長經驗。改革開放到 1990 年之前出生的民眾，其成長歷經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社會快速變遷的時代；而 90 後的世代，則是在全球化和網路世代成長下的一代，其生活經驗和成長背景也與之前兩個世代有所差異。為了變數處理需要，本文將世代差異化分成此三個世代。

龐大幅員與人口規模，以及各省市在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的諸多差異，我們選擇在模型中加入省市虛擬變量 (dummy variables)，以修正在該層次上所出現的依變數差異。

我們可將本研究所使用的迴歸模型表示如下：<sup>11</sup>

$$\begin{aligned}
 DV = & \beta_0 + \beta_1 evaldiff + \beta_2 patriot / nationalism + \beta_3 evaldiff \\
 & \times patriot / nationalism + \beta_4 centraleval + \beta_5 localeval \\
 & + \beta_6 econeval + \beta_7 newsdaily + \beta_8 income + \beta_9 otavalues \\
 & + \beta_{10} female + \beta_{11} edugroup + \beta_{12} agegroup + \beta_{13} ruralhukou \\
 & + \beta_{14} partymember + \beta_{prov} provincedummy + e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DV* 包含了本文的兩個研究依變數：「自由民主價值」與「普遍體制支持」， $\beta_1$  係數則為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 $\beta_3$  則為愛國 / 民族主義對於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在本節以下的分析中，我們將先針對中國大眾的民主評價差異、愛國 / 民族主義以及民主支持做跨年度的總體性資料描述，其次，則以民主支持為依變數，驗證民主評價差異的影響力，並在第三部份檢視愛國與民族主義如何直接影響民主評價差異，及驗證愛國 / 民族主義對於民主示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作用。

### 三、中國大陸的大眾民主支持、愛國 / 民族主義與民主評價差異

我們首先想知道的是，在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 / 體制支持程度，對中國大陸、美國以及臺灣的民主表現評價，以及愛國 / 民族主義的情緒，在總體層次上是否有明顯的消長。為清楚呈現趨勢，我們先將民主支持指標與體制支持指標除以題組題數，形成對該指標的平均同意比例。圖 2 顯示，無論是正向或反向的民主支持指標，在 2011~2019 近十年間均沒有大幅的波動。其中，自由民主價值的大眾支持均不及五成，而體制支持則有接近七成。該結果符合近期的一些研究發現 (Lu & Dickson, 2020)，顯示民眾確實高度認同中國現有的政治體制。

<sup>11</sup> 迴歸式中變數名稱的英文代號如下：evaldiff：民主評價差異；patriot/nationalism：愛國 / 民族主義；centraleval：中央治理評價；localeval：地方治理評價；newsdaily：每日閱讀政治訊息；income：收入水平；otavalues：OTA 傳統價值；female：女性；edugroup：教育程度；agegroup：世代群體；ruralhukou：農村戶口；partymember：共產黨員；provincedummy：省虛擬變數。

相較之下，民眾對於美國、臺灣以及中國大陸本身的民主評價，則有較為明顯的改變。圖 3 顯示，中國民眾對美國與臺灣民主評價逐漸下降，但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則逐漸上升，圖 4 則顯示，在 2019 年的調查中，甚至有接近半數的中國民眾認為本國的民主分數要比美國與臺灣來得更好。這表示中國大陸民眾對於這三個地區的民主表現評價，顯然有別於 V-dem 計畫所諮詢的專家意見，顯示在威權政體下，民眾對於「民主」的認識及評價民主的標準，確實與政治學者的看法有極大的差異（Diamond, 2010）。

最後，圖 5 顯示近十年中國大陸民眾高漲的民族與愛國主義。<sup>12</sup>除了「假如其他國家的人變得更像中國人，世界將更美好」之外，其餘的指標均有八成左右的支持度，並且不分愛國或民族主義指標，均逐年地增高。不過，總的來說，在總體的層次上，我們並未見到民主評價差異的改變，與民主／體制支持程度的相關性，也無法由總體層次上發現高漲的愛國／民族主義如何影響民主支持。然而，我們確實發現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與民族主義，在一個已經很高的基礎上更加提昇。

#### 四、民主示範效果的經驗證據

接著我們利用個體層次的迴歸分析來驗證本文的研究假設。為清楚標明各迴歸係數的方向、效果大小（effect size）與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我們將美－中民主評價差異對於民主支持指標與體制支持的迴歸係數整理為圖 6。<sup>13</sup>迴歸模型結果顯示，美－中民主評價差異在 2011 年與 2015 年的調查中，均顯著地降低了大眾對既有體制的支持，並且在三次調查中均正向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由於該效果在 2011 年、2015 年與 2019 年三個不同年份的調查資料都呈顯著，顯示該效果的穩固性，並不受這十年間中美關係的劇烈改變以及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情勢所影響。圖 7 則顯示在相同的模型設定下，主要自變數變動為「兩岸民主評價差異」的迴歸係數。<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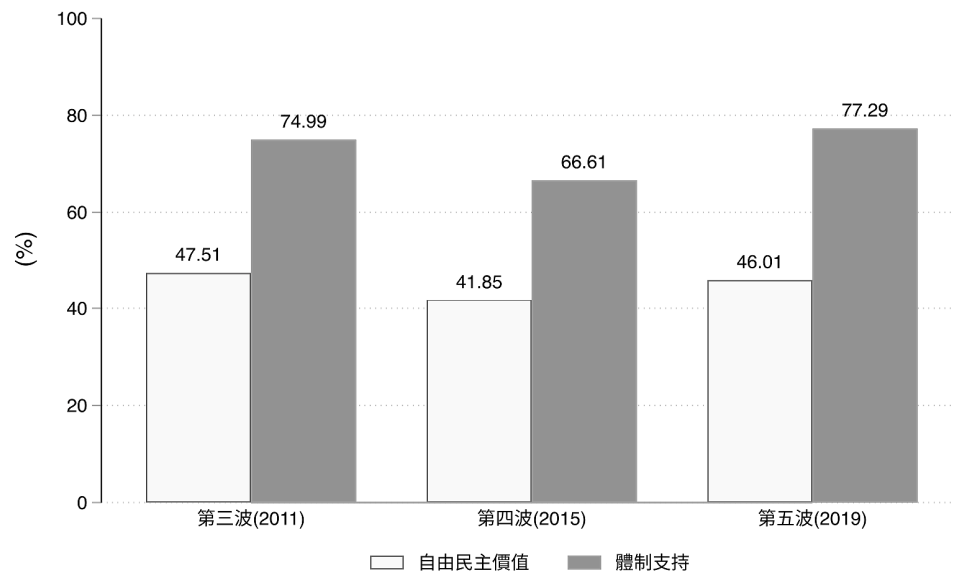
<sup>12</sup> 在我們所使用的三次調查中均包含愛國主義題組，但民族主義題組僅出現在 2015 年與 2019 年的調查中。

<sup>13</sup> 完整的迴歸模型請參考表 5。其中，模型 1 至 3 的依變數為對現有體制的支持程度，模型 4 至 6 則是對自由民主價值進行迴歸。

<sup>14</sup> 完整的迴歸模型請參考表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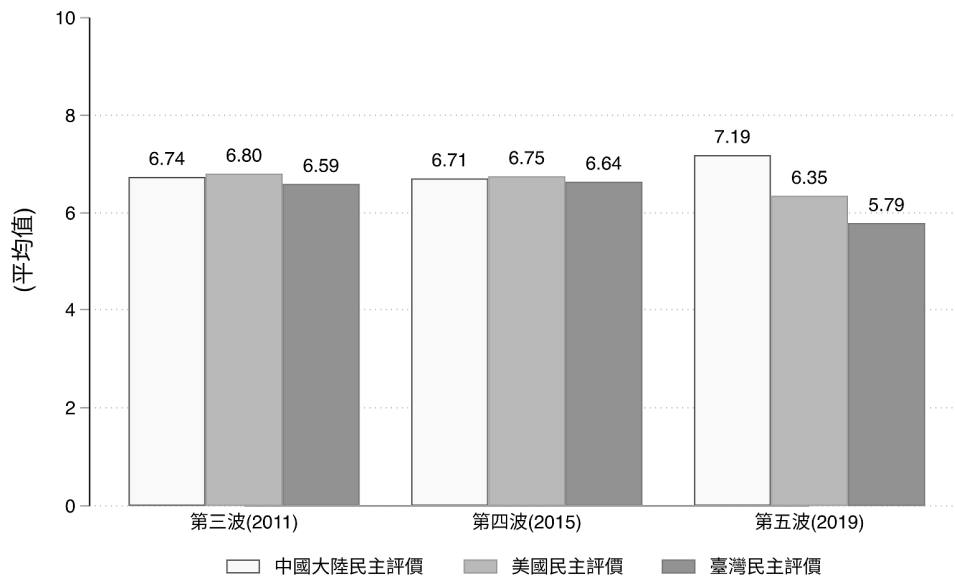


圖 2 民主支持與政體支持指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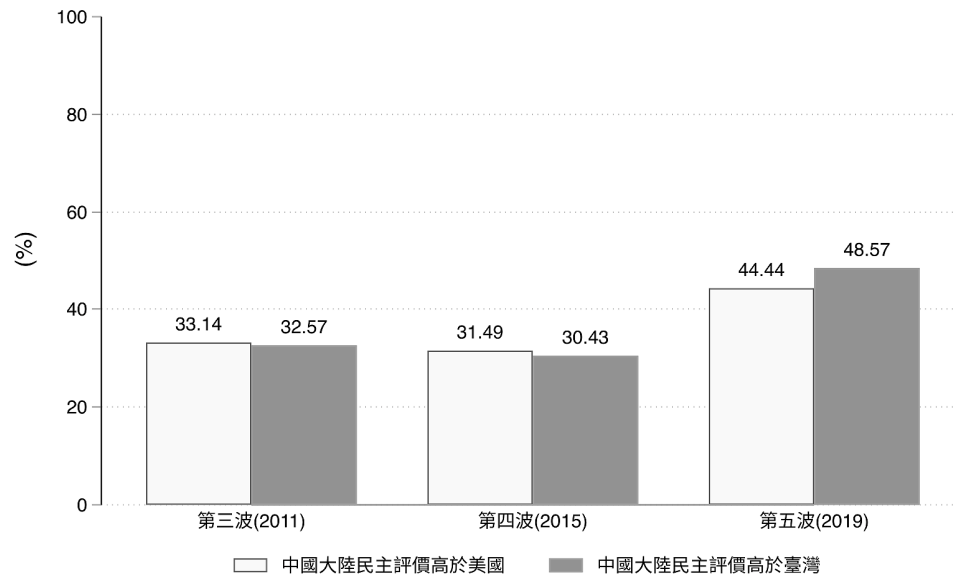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3 中國大陸民衆的民主評價差異(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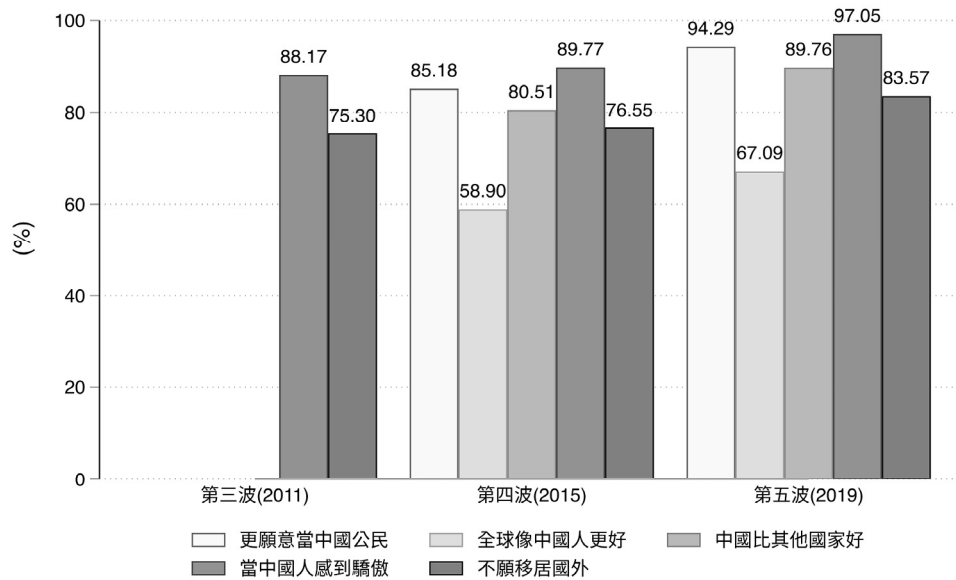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4 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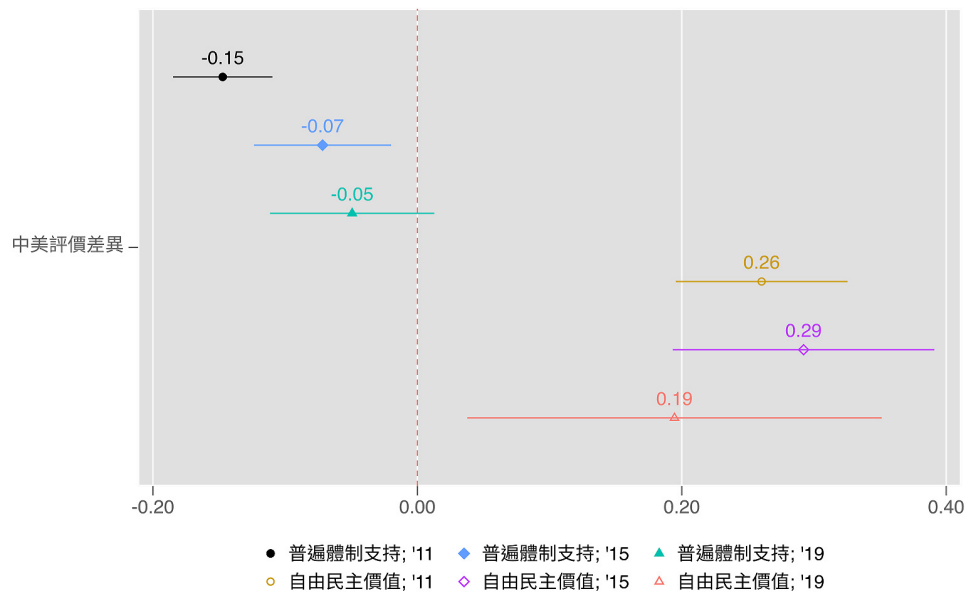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5 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民族主義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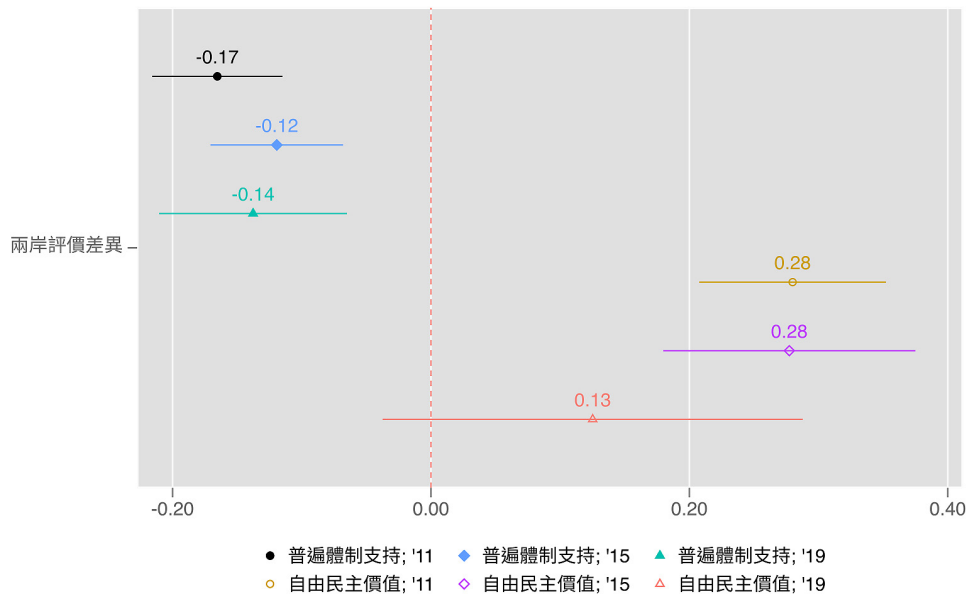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6 美國民主示範效果：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 (Chu et al., 2020)

圖 7 臺灣民主示範效果：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 (Chu et al., 2020)

表 5 迴歸模型：美國民主示範效果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中美評價差異	-0.147*** (0.019)	-0.072*** (0.026)	-0.049 (0.032)	0.260*** (0.033)	0.292*** (0.050)	0.194** (0.080)
愛國／民族主義	0.339*** (0.031)	0.325*** (0.013)	0.319*** (0.024)	-0.025 (0.078)	0.029 (0.030)	0.008 (0.053)
愛國／民族主義×中美評價差異	0.052*** (0.010)	0.006 (0.006)	-0.002 (0.008)	-0.100*** (0.015)	-0.049*** (0.012)	-0.034** (0.017)
中央治理評價	0.814*** (0.116)	0.389*** (0.091)	0.445*** (0.084)	0.666*** (0.225)	0.520*** (0.159)	0.715*** (0.156)
地方治理評價	0.270*** (0.101)	0.364*** (0.084)	0.284*** (0.071)	-0.245* (0.129)	-0.194* (0.114)	-0.065 (0.111)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49*** (0.060)	0.227*** (0.059)	0.118** (0.047)	-0.036 (0.101)	-0.197*** (0.060)	-0.115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1* (0.052)	0.191*** (0.052)	0.186*** (0.037)	0.333*** (0.102)	0.326*** (0.076)	0.222** (0.097)
家庭經濟狀況	0.080* (0.043)	0.074*** (0.022)	0.068** (0.030)	0.238*** (0.056)	0.065 (0.061)	0.135** (0.053)
OTA 價值	0.087*** (0.028)	0.160*** (0.020)	0.131*** (0.033)	-0.534*** (0.042)	-0.337*** (0.052)	-0.292*** (0.064)
女性	-0.178** (0.082)	-0.149*** (0.040)	-0.194*** (0.045)	-0.347*** (0.070)	-0.122* (0.074)	-0.418*** (0.064)
教育程度	0.061 (0.043)	0.194*** (0.028)	0.199*** (0.023)	0.509*** (0.126)	0.740*** (0.060)	0.503*** (0.056)
年齡群體 = 79 後	-0.035 (0.064)	0.021 (0.037)	0.041 (0.056)	0.475*** (0.114)	0.669*** (0.112)	0.365*** (0.078)
年齡群體 = 90 後	0.172 (0.116)	0.270*** (0.090)	0.061 (0.065)	1.181*** (0.193)	0.648*** (0.108)	0.470*** (0.103)
鄉村戶口	-0.016 (0.084)	0.004 (0.058)	-0.026 (0.070)	-0.477*** (0.134)	-0.358*** (0.114)	-0.026 (0.088)
黨員	0.178*** (0.054)	0.079* (0.043)	0.061 (0.043)	0.238** (0.104)	0.304*** (0.094)	0.082 (0.067)
R-squared	0.241	0.282	0.226	0.313	0.349	0.257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迴歸係數標準誤表示於括號中

\* $p < 0.1$ , \*\* $p < 0.05$ , \*\*\* $p < 0.01$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6 迴歸模型：臺灣民主示範效果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兩岸評價差異	-0.165*** (0.026)	-0.119*** (0.026)	-0.138*** (0.037)	0.280*** (0.037)	0.277*** (0.050)	0.125 (0.083)
愛國 / 民族主義	0.351*** (0.031)	0.321*** (0.014)	0.324*** (0.026)	-0.057 (0.086)	0.001 (0.034)	-0.008 (0.052)
愛國 / 民族主義 × 兩岸評價差異	0.057*** (0.012)	0.015** (0.006)	0.013* (0.008)	-0.111*** (0.018)	-0.043*** (0.011)	-0.024 (0.018)
中央治理評價	0.809*** (0.115)	0.383*** (0.088)	0.421*** (0.077)	0.664*** (0.228)	0.513*** (0.159)	0.684*** (0.160)
地方治理評價	0.272*** (0.099)	0.361*** (0.086)	0.283*** (0.071)	-0.257* (0.138)	-0.192* (0.116)	-0.083 (0.113)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49*** (0.055)	0.229*** (0.059)	0.113** (0.047)	-0.046 (0.100)	-0.209*** (0.060)	-0.125 (0.086)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11** (0.052)	0.193*** (0.052)	0.173*** (0.035)	0.318*** (0.102)	0.335*** (0.077)	0.219** (0.098)
家庭經濟狀況	0.077* (0.043)	0.072*** (0.022)	0.068** (0.030)	0.241*** (0.055)	0.076 (0.062)	0.134** (0.053)
OTA 價值	0.090*** (0.027)	0.160*** (0.020)	0.133*** (0.033)	-0.541*** (0.041)	-0.334*** (0.050)	-0.293*** (0.064)
女性	-0.177** (0.083)	-0.157*** (0.039)	-0.182*** (0.045)	-0.348*** (0.072)	-0.119* (0.071)	-0.424*** (0.063)
教育程度	0.044 (0.044)	0.195*** (0.028)	0.194*** (0.023)	0.539*** (0.118)	0.752*** (0.061)	0.513*** (0.056)
年齡群體 = 79 後	-0.046 (0.063)	0.006 (0.035)	0.029 (0.055)	0.497*** (0.117)	0.697*** (0.107)	0.376*** (0.077)
年齡群體 = 90 後	0.140 (0.117)	0.240*** (0.090)	0.045 (0.064)	1.226*** (0.199)	0.701*** (0.104)	0.487*** (0.100)
鄉村戶口	-0.019 (0.086)	0.006 (0.060)	-0.026 (0.069)	-0.480*** (0.136)	-0.373*** (0.114)	-0.027 (0.088)
黨員	0.187*** (0.054)	0.073* (0.043)	0.058 (0.045)	0.221** (0.101)	0.307*** (0.096)	0.076 (0.066)
R-squared	0.243	0.285	0.230	0.311	0.347	0.255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我們發現，臺灣的民主示範效果亦十分顯著，在三次調查中均顯著減弱人們的體制支持，也在 2011 年與 2015 年的調查中展現對自由民主價值的正面影響效果。

另外，綜觀迴歸分析的結果，在控制變數中，無論是對中央或地方的治理評價、對於經濟表現的評價、或是性別年齡等社會經濟學變數，均未對體制支持或自由民主價值有顯著影響力，或是影響的方向性並不一致，更沒有跨年度的影響。其中，地方治理評價與經濟表現評價的影響性符合理論預期，顯著地增加人們的體制支持，減弱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然而在顯著性上，並不如中美與兩岸的評價差異。另外，每日閱聽政治訊息者對本文兩個理論上方向逆反的依變數均有正面的影響，對於體制支持，我們認為是政治宣傳的結果，而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促進，則多來自閱聽政治訊息將提昇人們的「政治知識」，有助於讓人們理解抽象複雜的價值問題（Lei & Lu, 2017），並反映在自由民主價值的提昇上。我們另外也發現女性雖然較不支持體制，但並沒有比較高的自由民主價值，而教育程度的提昇與改革開放後的世代身份，則如同閱聽政治訊息一般，對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都有提昇的作用，這反映了在中國大陸中，教育程度高者或年輕世代更有可能成為新興中產階級，而作為經濟發展的得利者，對於當下的威權政體將更為擁護的現實（Chen & Lu, 2011）。但同時，高教育程度者或青年世代在價值傾向上，卻又如同其他西方國家一般，比教育程度低者更傾向自由價值（Wang, 2007）。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控制變數中，「權威傾向」傳統價值完全符合了過去研究的結果（Shi, 2014），是限制民主支持與維繫威權傾向的長期重要因素。

綜上所述，藉由迴歸模型的檢驗，我們提出了支持假設 1a 至 1d 的經驗證據。<sup>15</sup> 此外，我們另外要提出的一點是，雖然單從迴歸係數上看來，民主評價差異的效果似乎相當小，但基於該變數在本文的編碼中是一個由

<sup>15</sup> 除了正文表 5 與表 6 的迴歸分析之外，作者亦利用另外兩組測量民主支持程度的指標，包含「自由的民主認知」（liberal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LUD）以及「反對一黨專制體制」（detach from one-party regime）兩者作為迴歸模型依變數，並以表 5 與表 6 相同的模型設定進行迴歸分析，以作為穩固性檢定（robustness check）的一部分。我們發現無論使用何種民主支持指標，民主評價差異對於民主支持均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效果。

-9 到 9 的差值指數，以 2015 年的調查資料為例，在各變數均以平均值帶入的基線模型中，若美中民主評價差異由 -9 提昇至 9，則預測自由民主價值將會由 3.6 提昇至 5.4 分（滿分為 10 分），體制支持程度則會由 3.1 分下降至 2.2 分（滿分為 4 分），分別影響了 0.73 與 0.64 個標準差，影響的程度要比所有控制變數要高，僅次於教育程度的影響。<sup>16</sup>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 2019 年的調查中，美中評價差異與兩岸評價差異分別在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兩個層面失去顯著影響力，且效果與 2011 與 2015 年的結果相比，呈現一逐步下滑的趨勢。究其原因，我們認為正與我們在前一節的資料描述中所提到的，即便在如 V-dem 等專家資料庫中，中美或兩岸的民主程度一直相距甚遠，但對中國大陸民眾而言，美國與臺灣的民主表現其實在不斷地下降，而對本國的民主評價反而上升。在總體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水平並未隨之波動的情況下，反映的便是民主示範效果的不斷減弱。

此外，對於該現象，我們還能從兩方面來進一步討論。第一，正如我們在前面所提到的，目前並不是民主政體最好的時代。由本文前段顯示的美國與臺灣 V-dem 分數來看，即便在整個九〇年代，兩國在各民主面向上均有極佳表現，但在 2015 年之後，兩國的民主表現都有所下降，特別是美國，作為世界民主的旗手（flag-bearer），當近年來美國因川普總統的許多反民主舉措而在民主表現上有所倒退時，不僅是學界對於美國的民主表現評價有日益負面的趨勢（Diamond, 2019），國際媒體或研究機構也開始質疑美國在全球民主社會中的領導作用（Bremmer, 2019；Diamond, 2020；Hannah & Gray, 2020；Hannah, 2019）。因此，也可能是中國大陸民眾也觀察到了美國與臺灣在真實民主表現的不斷退步，因此影響了民主示範的效果。另一方面，中國大陸在 2015 年之後的權威集中化與輿論管控升級，也將影響人們對於境外政治的理解，更有機會因直接的政府宣傳而扭曲對境外民主表現的評價（Qiang, 2019）。

<sup>16</sup> 至於兩岸評價差異的部份，一樣是在 2015 年的調查資料中，當評價差異一樣由 -9 提昇至 9 分時，自由民主價值將會由 3.6 上升至 5.5，體制支持的程度將由 3.2 下降到 2.1，影響程度分別為 0.77 與 0.78 個標準差，且均有顯著差異。

然而，除了直接影響民主評價差異的因素之外，本文還提出了另一個影響民主示範效果的可能因素：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的負向調節作用。接下來，我們將更進一步，驗證在中國大陸逐步上升的民族與愛國主義情緒，是否削弱本節所驗證的美國與臺灣的民主示範效果。

## 五、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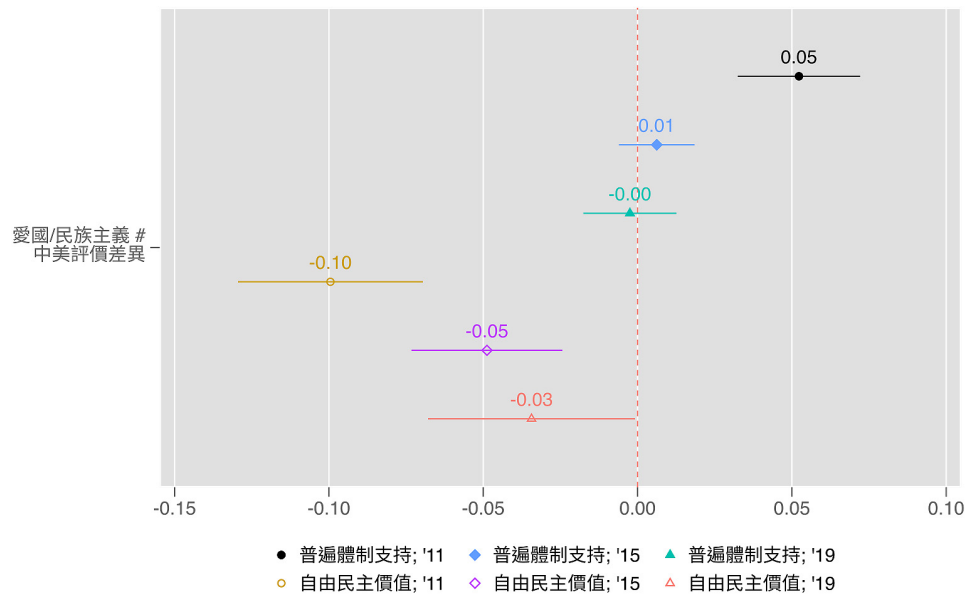
首先，在討論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attenuating effect）之前，我們將先驗證研究假設 2a 與 2b，即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否對民主支持本身有負面的影響。表 5 與表 6 均顯示，愛國與民族主義僅對於普遍體制支持有正面影響，但對於自由民主價值而言，則並無顯著影響力。該發現驗證了本文的假設 2b，也符合先文回顧的論述，即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長期做為中國大陸政府用以強化統治正當性的工具，因此與體制支持高度相關，也在意料之中。相較之下，由於在中國大陸官方的操作，以及民間的愛國／民族主義發展中，主要目標在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並無太多與自由或威權價值相關的論述（Schneider, 2018；Weatherley, 2014），因此，假設 2a 無法被驗證，也在情理之中。

進一步地，我們希望驗證假設 3a 與 3b，即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亦即對於隨著愛國／民族主義情緒的發酵，即便人們對美、中、臺的民主評價與國際政治學者相仿，但這些民眾的民主支持程度卻不會隨著提昇。為了驗證這個假設，我們的迴歸模型中包含了愛國／民族主義與中美及兩岸民主評價差異的交互作用項（interaction term），其迴歸係數即參之二節中模型 1 的  $\beta_3$ 。

我們將愛國／民族主義情緒與中美、兩岸評價差異交互作用項的迴歸係數分別整理於圖 8 與圖 9。結果顯示，在體制支持層面上，僅有 2011 年的愛國主義情緒對美國的示範效果有調節作用，但無論哪一年度，愛國／民族主義都對臺灣的示範效果有顯著的調節作用。另一方面，對於自由民主價值而言，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則十分顯著，僅在 2019 年的臺灣示範效果中不存在調節作用，但由係數圖中可看出，其影響方向仍舊符合我們的假設，是負向的調節效果，且距離統計顯著的門檻相當接近。就以上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說經驗證據為本文的假設 3a 提供了足夠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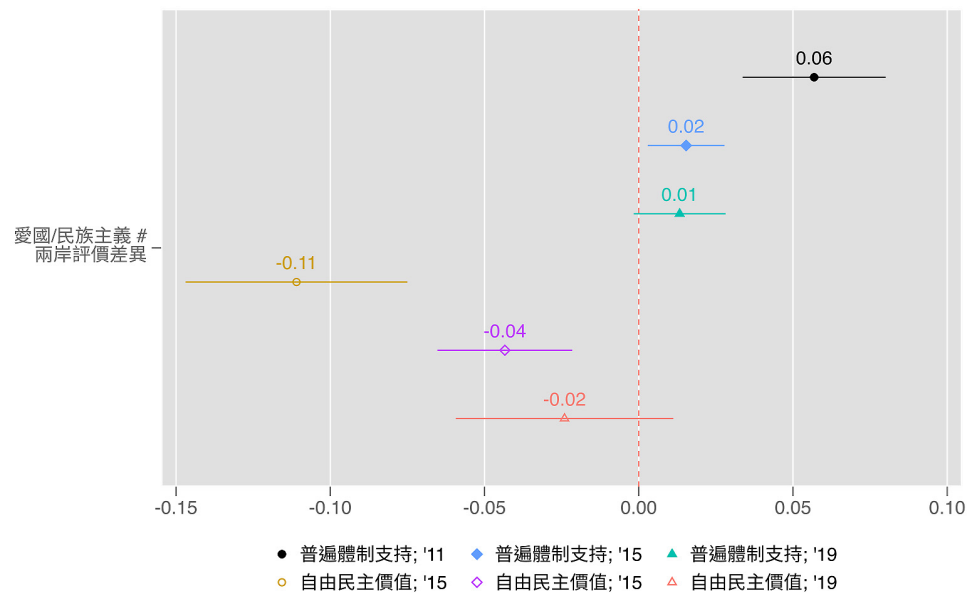


圖 8 愛國 / 民族主義對美國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係數整理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圖 9 愛國 / 民族主義對臺灣民主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係數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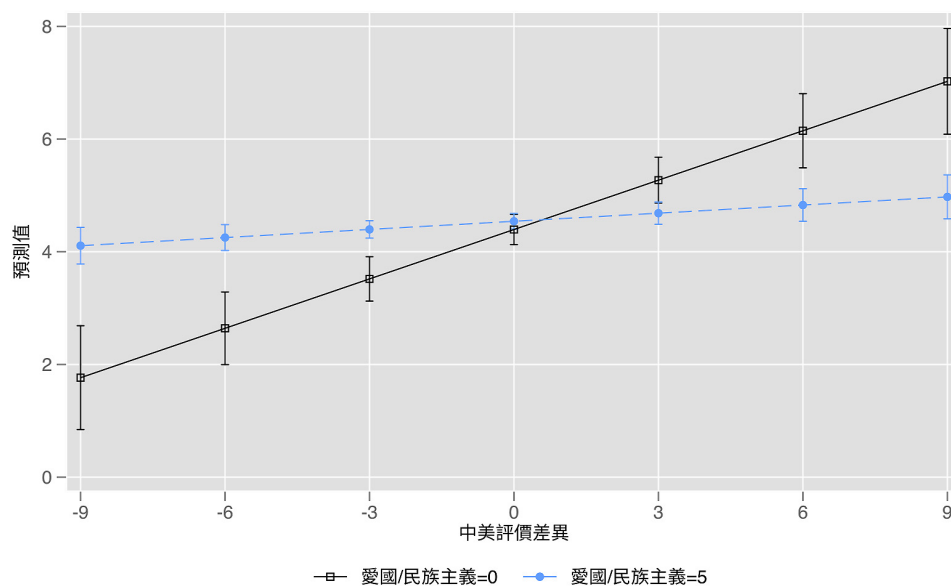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1、2015、2019（Chu et al., 2020）

但僅部份證實了假設 3b。

爲了更清楚地呈現該調節效果的作用，我們更進一步地藉由邊際效果的計算，<sup>17</sup> 來視覺化愛國／民族主義對民主示範效果的負向調節作用。圖 10 顯示，在毫無愛國／民族主義情緒時，由最低的中美評價差異 (-9) 上升到最高的中美評價差異 (9) 後，個人的自由民主價值將由接近兩分的低分顯著地提升到七分的水準。相對地，在最高的愛國／民族主義情緒下，即便中美評價差異由最低分上升到最高分，也沒有顯著提昇人們的自由民主價值。另一方面，圖 11 則顯示，兩岸民主評價差距能在低愛國／民族主義者身上產生對體制支持顯著的負面效果，但對於強愛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兩岸民主評價則幾乎不會改變人們對體制的支持程度。從這兩個例子中，我們能明顯看出愛國／民族主義顯著的調節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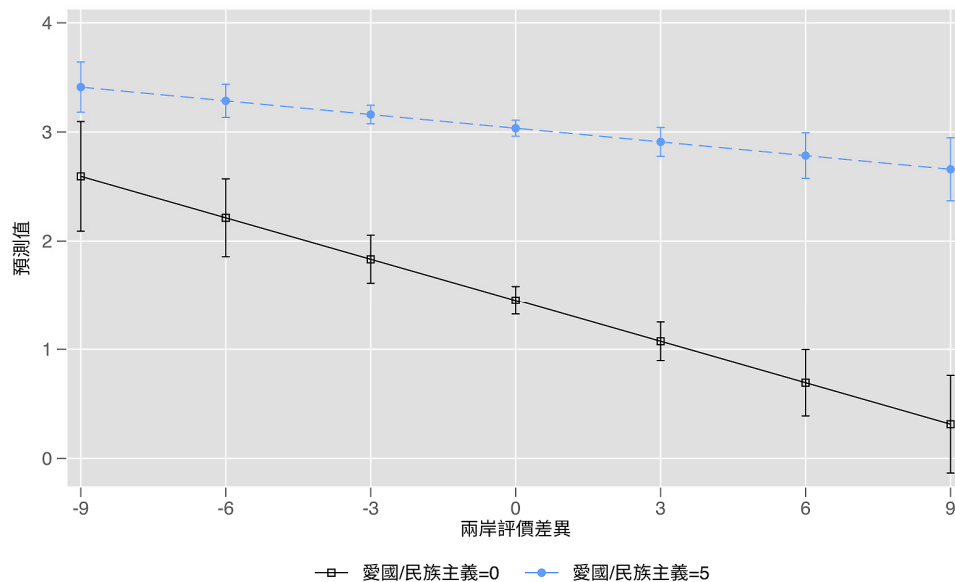
圖 10 愛國／民族主義對美國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自由民主價值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5 (Chu et al., 2020)

<sup>17</sup> 我們呈現於此的邊際效果爲表 5 的模型 5 以及表 6 的模型 2，基線模型設定爲除愛國／民族主義與民主評價差異外，其餘變數均以其該年度平均值帶入。亦即我們在此顯示的是「樣本均值時的邊際效應」(marginal effects at the means, MEMS)。

圖 11 愛國 / 民族主義對臺灣示範效果的調節作用：體制支持



資料來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國大陸調查，調查年度：2015（Chu et al., 2020）

## 肆、結論

相較促進或誘發威權國家之內種種有利或不利於民主轉型的因素，例如經濟發展或種族紛爭，或是傳統上外國勢力直接介入的強制（coercion）或競爭（competition）的機制（Miller, 2016），本文提出一個可能為全球民主倡議者著力的「民主示範效果」，即民主陣營若欲引發威權大眾的民主支持，使其有更高的轉型可能性，則應當從「軟實力」與「公共外交」的角度出發，深化既有民主的核心價值，強化民主運作的機制，使民主國家在威權大眾心中的表現優於本國，兩相比較下的差距，將使人們失去對既有體制的支持，同時提昇人們的自由價值傾向。藉由分析自 2011 年至 2019 年間，在當今人口最多，經濟與軍事實力也不斷壯大的威權政體－中國大陸所進行的民調資料，我們為本文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 / 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提出了穩固的證據基礎。我們發現，無論是美國或是臺灣，其民主示範效果對於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均有顯著影響，該效

果並不隨著中美與兩岸關係的惡化或中國大陸政治的威權化而消逝，其穩固性也是其他可能影響民主支持的變數，如收入水平、文化價值、教育程度，甚至是威權政體治理評價所未在迴歸模型中展現的。實證分析的結果使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民主國家對威權大眾所帶來的示範效果，將是國際關係層次上，民主陣營得以影響全球民主前景的關鍵因素。亦即，作為與中國大陸互動最頻繁的民主政體，臺灣與美國若能維持穩定的民主表現，「說好民主故事」，並能夠明確傳達給威權大眾，則由外而內地影響威權國家的大眾民主支持是有可能的。正如三十年前的東德人比較自己的日常生活，與穿過檢查站後所見到的自由社會一般，唯有民主社會不斷強化自身，才有使威權社會的人們心嚮往之的可能。

但同時，本文另一個重要的實證發現則指明，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不僅有效地協助中國大陸的執政者鞏固民眾對現有體制的向心力，也牽制著民主示範機制對自由價值的提昇效果。此外，本文的資料顯示，近十年來，中國大陸民眾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有增無減，並且長期維持在非常高的水平。姑且不論該回答是否存在政治正確或政治敏感的因素，<sup>18</sup> 但如此高度的愛國與民族主義情緒，將顯著地削弱民主國家所可能帶來的任何示範效果，使人們對此免疫。

更重要的是，對於中國大陸民眾而言，此刻也絕非了解美國與臺灣民主實際運作狀況的最好時機。自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執政以來，政府對於民間資訊流通的限制日益增強，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操縱及管控輿論 (King et al., 2013 ; 2017 ; Qiang, 2019 ; Zhong et al., 2017)，因此，若中國大陸官方也意識到美國與臺灣的民主政治運作可能帶來示範的效果，則對於該類資訊的管控必將更加嚴厲。其次，在中國官方媒體的宣傳手法上，針對美國或臺灣的民主運作，也常以負面報導居多。在外界資訊難以傳入，內部又有官方操作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民眾能夠得到多少與民主國家實際民主運作情形有關的資訊，令人不容樂觀。在中美貿易戰與兩岸關係惡化的背景下，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對於愛國主義的強烈宣傳，以及民間對臺美雙方對臺灣議題操作的不滿，也將加強本文所提的調節效果，中和臺美兩地

<sup>18</sup> 針對中國大陸民眾回答政治敏感問題時的無反應或調查偏誤，請見本文參之一節的討論。

的民主示範作用。我們也由調查資料中發現，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與 V-Dem 計畫的評價差異差距甚大，甚至完全相反，這顯示對於大多數中國大陸民眾而言，中國大陸的政治運作並不威權，其民主表現甚至高於我們所認定的民主國家。本文在此並未試圖為該現象提出解釋，但美國與臺灣，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實際政治運作，有多少資訊能為中國大陸民眾知悉，其中又有多少為官方資訊管控的結果，則需要學界更長期且深入的觀察。

不過，對於民主學者而言，雲後依舊有光。我們雖未見到中國大陸隨著世代替代 (cohort replacement) 而出現爆炸性的政治民主需求 (Wang, 2007)，但調查資料顯示，在 2011、2015 及 2019 年的十年間，即便有美國與全球的民主衰退、高漲的民族與愛國主義，以及居高不下的威權體制支持，但同時，中國大陸的大眾民主支持指標卻未有太大的改變，依舊有近半的人們傾向民主自由價值，且民主示範效果依舊穩固。因此，在型塑中國大陸民主支持機制的背後，必然還有更複雜的因素。正如一路以來民主研究者所發現的，型塑大眾民主支持的原因絕非單一要素，而是歷史遺緒、社會價值與現代化過程緊密交織的交互作用產物，而我們在此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也僅是諸多砝碼之一。然而，我們希望本文所提出的論點，能使有志於推廣全球民主者能有新的著力點。威權政府雖能利用假新聞與各種對外宣傳侵蝕民主政體的信任根基 (Bartlett, 2018; Brady, 2015; Terry, 2019)，但相對地，無論幅員大小或國力強弱，民主國家也得以藉由民主的實踐與深化，藉由文化軟實力與更開放的國境，藉由公共外交的方式，讓民主被看見，使民主政體不僅為國民所欲，也使威權國家中的公民傾慕，如此，我們即能在鞏固自身民主的同時，為全球的民主前景添加薪火。

## 參考書目

- Acemoglu, D. & J. A. Robinson. 2006. *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lagappa, M. 1995. "Democracy's Future: The Asian Spectrum." *Journal of Democracy* 6(1): 29-36.
- Ansell, B. W. & D. Samuels. 2014.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n Elite-competition Approa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rtlett, J. 2018. *The People Vs Tech: How the Internet is Killing Democracy (and How We Save It)*. London: Ebury Press.
- Boix, C. & S. C. Stokes. 2003. "Endogenous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tics* 55: 517-549.
- Brady, A. M. 2015. "China's Foreign Propaganda Machin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4): 51-59.
- Bremmer, I. 2019. "The World Wants Democracy. Not Necessarily the U.S. Version." in <https://time.com/5590236/what-defines-worldwide-democracy/>. Latest update 9 November 2020.
- Brinks, D. & M. Coppedge. 2006. "Diffusion Is No Illusion Neighbor Emulation in the Third Wave of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39(4): 463-489.
- Chan, E. & J. Chan. 2014. "Liberal Patriotism in Hong Ko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952-970-952-970.
- Chan, K. & G. P. Prendergast. 2008. "Social Comparison, Imitation of Celebrity Models and Materialism among Chinese You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27(5): 799-826.
- Chang, Y. T., Y. H. Chu, & F. Tsai. 2005.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c Values in Three Chinese Societies." *Issues & Studies* 41(4): 1-33.
- Chen, J. & B. J. Dickson. 2008. "Allies of the State: Democratic Support and Regime Support among 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 *China Quarterly* 196(196): 780-804.
- Chen, J. & C. Lu. 2011.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Middle Class in China."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4(3): 705-719.
- Chu, Y. H. & M. H. Huang. 2010. "Solving An Asian Puzzle." *Journal of Democracy* 21(4): 114-122.
- Chu, Y. H. 2013a. "Contending Perspectives on Sourc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and Regime Support in East Asia."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9(1): 1-11.
- Chu, Y. H. 2013b. Sources of Regime Legitimacy and the Debate over the Chinese model. *China Review* 13(1): 1-42.
- Chu, Y. H., Y. T. Chang, M. H. Huang, C. C. Chou, H. H. Tung, C. E. Wu, K. P. Huang, J. M. Kuo, C. Y. Wei, & M. Weatherall. 2020. *Asian Barometer Survey Datasets*. Taiwan: Taipei.
- Claassen, C. 2019a. "Estimating Smooth Country-year Panels of Public Opinion." *Political Analysis* 27(1): 1-20.
- Claassen, C. 2019b. "In the Mood for Democracy? Democratic Support as Thermostatic Opin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4(1): 36-53.

- Claassen, C. 2020. "Does Public Support Help Democracy Surv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4(1): 118-134.
- Coppedge, M., J. Gerring, C. H. Knutsen, S. I. Lindberg, J. Teorell, D. Altman, M. Bernhard, M. S. Fish, A. Glynn, A. Hicken, A. Luhrmann, K. L. Marquardt, P. Paxton, K. McMann, D. Pemstein, B. Seim, R. Sigman, S. E. Skaaning, J. Staton, S. Wilson, A. Cornell, N. Alizada, L. Gastaldi, H. Gjerlow, G. Hindle, N. Ilchenko, L. Maxwell, V. Mechkova, J. Medzihorsky, J. von Romer, A. Sundstrom, E. Tzelgov, Y. T. Wang, T. Wig, & D. Zilblatt. 2020. "V-Dem Country-Year/CountryDate Dataset v10." in <https://www.v-dem.net/en/data/reference-materials-v10/>. Latest update 3 November 2020.
- Cull, N. J. & F. J. R. Jiménez. 2015. "Introduction: Soft Power, Public Diplomac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US Public Diplomac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Spain Selling Democracy?* eds. Francisco Javier Rodríguez Jiménez, Lorenzo Delgado Gómez-Escalonilla, & Nicholas J. Cu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14.
- Dahl, R. A. 1971.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ahl, R. A. 2000. *On Democracy*.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iamond, L. 1990. "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1(3): 48-60.
- Diamond, L. 2009. *The Spirit of Democracy: the Struggle to Build Free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Books/Henry Holt and Co.
- Diamond, L. 2010. "The Meanings of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1(4): 102-105.
- Diamond, L. 2019. *Ill Winds: Saving Democracy from Russian Rage, Chinese Ambition, and American Complacency*.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Diamond, L. 2020. "I'm A Democracy Expert. I never thought We'd Be So Close to A Breakdown." in <https://www.nytimes.com/2020/11/01/opinion/election-vote-2020.html>. Latest update 3 November 2020.
- Dickson, B. J. 1998. "China'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aiwan Experience." *Asian Survey* 4(38): 349-364.
- Foa, R. S. & Y. Mounk. 2016. "The Democratic Disconnect." *Journal of Democracy* 27(3): 5-17.
- Gilley, B. & L. Diamond, eds. 2008.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Comparisons With Taiwan*. Boulder: Lynne Rienner.
- Gold, T. B. 1993. "Go with Your Feelings: Hong Kong and Taiwan Popular Culture in Greater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36: 907-925.

- Hannah, M. & C. Gray. 2020. "Global Views of American Democracy: Implications for Coronavirus and Beyond (April)." in <https://egfound.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Global-Views-of-American-Democracy-EGF.pdf>. Latest update 17 October 2020.
- Hannah, M. 2019. "From Democracy Promotion to Democracy Attraction: How the World Views American-style Democracy. Technical report, Eurasia Group Foundation." in <http://egfound.org/wp-content/uploads/2019/05/1905-15-Modeling-Democracy-Interactive-.pdf>. Latest update 17 October 2020.
- He, B. & Y. Guo. 2000.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Farnham: Ashgate Pub Ltd.
- Hollander, B. A. 1997. "Television News Exposure and Foreign Affairs Knowledge." *Gazette (Leiden, Netherlands)* 59(2): 151-161.
- Houle, C., M. A. Kayser, & J. Xiang. 2016. "Diffusion or Confusion? Clustered Shocks and the Conditional Diffusion of Democra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70(4): 687-726.
- Hu, P. 2018. "Popular Understanding of Democracy in Contemporary China." *Democratization* 25(8): 1441-1459.
- Huang, M. H., Y. H. Chu, & Y. T. Chang. 2013. "Understandings of Democracy and Regime Legitimacy in East Asia." in <http://globalbarometers.org/publications/81bf980a77b15bb2c0382e3f022c50ff.pdf>. Latest update 3 November 2020.
- Huang, M.H. & S. H. Chang. 2017.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East Asian Confucian Cultu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MNES: The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Society* 7(2): 1-40.
- Huntington, S. P. 1993.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Oklaho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Ingelhart, R. & C. Welzel. 2005.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ing, G., J. Pan, & M. E. Roberts. 2013. "How Censorship in China Allows Government Criticism but Silences Collective Express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7(2): 326-343.
- King, G., J. Pan, & M. E. Roberts. 2017. "H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abricates Social Media Posts for Strategic Distraction, Not Engaged Argumen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11(3): 484-501.
- Kosterman, R. & S. Feshbach. 1989. "Toward a Measure of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Attitud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0(2): 257-274.



- Krieckhaus, J., B. Son, N. M. Bellinger, & J. M. Wells. 2014. "Economic Inequality and Democratic Support." *Journal of Politics* 76(1): 139-151.
- Lei, X. & J. Lu. 2017. "Revisiting Political Wariness in China's Public Opinion Surveys: Experimental Evidence on Responses to Politically Sensitive Ques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6(104): 213-232.
- Leung, V., K. Cheng, & T. Tse, eds. 2013. *Celebrity Culture and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 in Asia: Use of Celebrity and its Influence on Society,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Bristol: Intellect Books.
- Linz, J. J. & A. Stepan. 1996.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Lipset, S. M. 1959. "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01): 69-105.
- Lu, J. & B. Dickson. 2020. "Revisiting the Eastonian Framework on Political Support: Assessing Different Measures of Regime Support in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52(4): 671-701.
- Meltzer, A. H. & S. F. Richard. 1981.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5): 914-927.
- Meltzoff, A. N. 1988a. "Imitation of Televised Models by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59(5): 1221-1229.
- Meltzoff, A. N. 1988b. "Infant Imitation After a 1-Week Delay: Long-Term Memory for Novel Acts and Multiple Stimuli."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4(4): 470-476.
- Miller, M. K. 2016. "Democracy by Example? Why Democracy Spreads When the World's Democracies Prosper." *Comparative Politics* 49(1): 83-104.
- Nathan, A. J. 2020. "The Puzzle of Authoritarian Legitim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31(1): 158-168.
- Norris, P. 2003. "Introduction: The Growth of Critical Citizens?" In *Critical Citizens*, ed. Norris Pipp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28.
- Nye, J. S. 1990.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 80: 153-171.
- Nye, J. S. 2008.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16(1): 94-109.
- O'Donnell, G. A., P. C. Schmitter, & L. Whitehead. 1986. *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Pan, H. H., W. C. Wu, & Y. T. Chang. 2017. "How Chinese Citizens Percei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Survey Results from Ten Major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 72 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評價差異與民主支持： 吳心喆、黃忠偉  
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 / 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

*China* 26(106): 616-631.

Przeworski, A. & F. Limongi. 1997. "Modernization: Theories and Facts." *World Politics* 49(2): 155-183.

Qiang, X. 2019. "President Xi's Surveillance St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30(1): 53-67.

Schedler, A. & R. Sarsfield. 2007. "Democrats with Adjectives: Linking Direct and Indirect Measures of Democratic Suppor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6(5): 637-659.

Schneider, F. 2018. *China's Digital Nation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i, T. 2014. *The Cultural Logic of Poli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in, D. C. 2011. *Confucian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lva, M. G. 1991.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romotion of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1(2): 7-25.

Sinkkonen, E. 2013. "Nationalism, Patriotism and Foreign Policy Attitudes among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China Quarterly* 216: 1045-1063.

Snow, C. E. 1981. "The uses of imitation."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8(1): 205-212.

Soroka, S., B. Andrew, T. Aalberg, S. Iyengar, J. Curran, S. Coen, K. Hayashi, P. Jones, G. Mazzoleni, J. W. Rhee, D. Rowe, & R. Tiffen, 2013. "Auntie Knows Best? Public Broadcasters and Current Affairs Knowledg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4): 719-739.

Sylvan, D. 2017.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Trajectory of Democrac, Global Challenges." in <https://globalchallenges.ch/issue/2/united-states-trajectory-democracy/>. Latest update 1 November 2020.

Tang, M., D. Woods, & J. Zhao. 2009. "The Attitudes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Towards Democracy."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4(1): 81-95.

Terry, L. 2019. "The Global Rise of "Fake News"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tic Elections in the US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22(1): 15-24.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20. "Timeline: U. S. Relations with China 1949-2020." in <https://www.cfr.org/timeline/us-relations-china>. Latest update 17 October 2020.

Tsang, S. 2009. "Consultative Leninism: China's New Political Framework."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62): 865-880.

- Von Beyme, K. 1987. *America as A Model*. Farnham: Gower Publishing Company.
- Wang, Z. 2007. "Public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6(53): 561-579.
- Weatherley, R. 2014. *Making China Strong*.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Weiss, J. C. 2014. *Powerful Patriots: 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lzel, C. 2006. "Democratization as An Emancipative Process: The Neglected Role of Mass Motiv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45(6): 871-896.
- Weyland, K. 2012. "The Arab Spring: Why the Surprising Similarities with the Revolutionary Wave of 1848?"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0(4): 917-934.
- Wu, J., Y. Li, & C. Song. 2019. "Temporal Dynamics of Political Trust in China: A Cohort Analysis." *China Information* 34(1): 109-136.
- Wu, W. C. & Y. T. Chang. 2019. "Income Inequality, Distributive Unfairness,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Evidence from East Asia and Latin America." *Democratization* 26(8): 1475-1492.
- Wu, W. C., Y. T. Chang, & H. H. Pan. 2017. "Does China's Middle Class Prefer (Liberal) Democracy?" *Democratization* 24(2): 347-366.
- Zhai, Y. 2018. "Popular Conceptions of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Satisfaction in China."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0(2): 246-262.
- Zhong, Z. J., T. Wang, & M. Huang. 2017. "Does the Great Fire Wall Cause Self-Censorship?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The Justification of Regulation." *Internet Research* 27(4): 974-990.

## 附錄

# 模型設定的討論與穩固性分析

首先，為區別調查年度是否對本文所提假設有所影響，我們將 2011、2015 與 2019 年所進行的三波調查資料合併，進行混合模型 (pooled model) 的估計，結果如表 7。我們發現，在民主評價差異與愛國／民族主義的交互作用項仍維持顯著的前提下，不同的調查年度確實對研究的依變數－民主支持指標，有顯著的影響力，顯示 2015 年與 2019 年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支持表現要比 2011 年來得低。該結果與我們在參之三節中所呈現的主要變數敘述統計（見圖 2）相符合，但藉由迴歸分析的方式，我們確認民主支持指標在不同年度的波動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力。

然而，作者在正文中所設定的迴歸模型，並不將調查年度做虛擬變項的處理，而是將不同波次的調查區分開來，進行獨立的分析，原因有二。首先，如同我們於參之一節所提到的，本文希望納入不同調查年度的資料進行分析，以確保本文所提出的「民主示範效果」與「愛國／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並不因 2011 至 2019 近十年間美中臺三方關係的快速變動，以及中國內部政治的威權化而受到影響，而若本文的兩個主要效果確實在某一年度失去作用，我們也能藉由分析該調查年度的國際關係脈絡，解釋效果改變的可能原因，如同作者們在正文中所做的。由於我們不單只是要確認調查年份對研究依變數有所影響，更要確認理論效果是否因時間變數而改變。為確認效果的依時變動，我們也能將本文的兩個主要效果變數與調查年度虛擬變數作交互作用項的處理，但基於本文主要論點已經包含了一個交互作用，為求結果闡釋的清晰與文章的易讀性，我們決定採取更直接且簡潔的方式進行迴歸分析。其次，混合模型的樣本數將大致是單一波次調查的三倍，倘若本文所提的理論效果於各年度調查均相同，則採取混合模型更容易達到文章寫作者所期待的統計顯著性。但相反地，由於我們將三波調查結果分開進行分析，在迴歸分析樣本數下降的情況下，若研究自變數對依變數仍有顯著影響，則我們得以利用更保守的樣本數達到相同的推論結果。因此，基於前面兩點，作者在本文中僅呈現各波調查分別進行

表 7 迴歸模型：將調查年度以虛擬變數處理

	(1) 體制支持	(2) LDV	(3) 體制支持	(4) LDV
中美評價差異	-0.098*** (0.010)	0.212*** (0.017)		
愛國 / 民族主義 × 中美評價差異	0.011*** (0.003)	-0.037*** (0.005)		
兩岸評價差異			-0.120*** (0.011)	0.220*** (0.019)
愛國 / 民族主義 × 兩岸評價差異			0.014*** (0.003)	-0.041*** (0.005)
愛國 / 民族主義	0.346*** (0.012)	0.028 (0.020)	0.348*** (0.011)	0.012 (0.020)
中央治理評價	0.559*** (0.043)	0.651*** (0.073)	0.548*** (0.043)	0.643*** (0.073)
地方治理評價	0.325*** (0.036)	-0.138** (0.061)	0.325*** (0.036)	-0.149** (0.061)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156*** (0.025)	-0.122*** (0.043)	0.155*** (0.025)	-0.134*** (0.043)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56*** (0.026)	0.301*** (0.043)	0.159*** (0.026)	0.297*** (0.043)
家庭經濟狀況	0.065*** (0.016)	0.158*** (0.027)	0.063*** (0.016)	0.160*** (0.027)
OTA 價值	0.130*** (0.011)	-0.376*** (0.019)	0.132*** (0.011)	-0.381*** (0.019)
女性	-0.197*** (0.022)	-0.322*** (0.038)	-0.194*** (0.022)	-0.325*** (0.038)
教育程度	0.178*** (0.014)	0.582*** (0.023)	0.172*** (0.014)	0.595*** (0.023)
年齡群體 = 79 後	0.027 (0.031)	0.615*** (0.052)	0.015 (0.030)	0.636*** (0.052)
年齡群體 = 90 後	0.163*** (0.043)	0.718*** (0.072)	0.141*** (0.042)	0.750*** (0.072)
鄉村戶口	-0.009 (0.027)	-0.267*** (0.045)	-0.009 (0.027)	-0.274*** (0.045)
黨員	0.080*** (0.030)	0.229*** (0.050)	0.080*** (0.030)	0.224*** (0.051)
第四波 (2015)	-1.075*** (0.052)	-1.223*** (0.089)	-1.069*** (0.052)	-1.218*** (0.089)
第五波 (2019)	-0.915*** (0.050)	-0.947*** (0.085)	-0.926*** (0.050)	-0.933*** (0.085)
樣本數	12410	12410	12410	12410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迴歸分析的結果。

其次，我們在此進行的第二項穩固性分析，則是以中國大陸民眾對美、中、臺三地的民主評價本身為自變數，對民主支持指標進行迴歸。也就是說，我們藉由對本國與他國的主觀評價，而非正文中所使用的評價差異，以避開在不同認知基礎上，民眾理解層次中不同國家的民主程度之間是否能夠相互比較的問題，如此，我們便能呈現在不考慮人們對本國與他國評分時所採用的標準是否一致的情況下，他國的民主是否能夠影響中國大陸民眾的民主支持程度。

表 8 與表 9 即為以美國與臺灣民主評價作為自變數的迴歸分析結果。結果顯示，無論是對美國或對臺灣的民主評價，在每一調查年度均對大眾的自由民主價值有顯著的正面影響力，此外，愛國／民族主義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調節效果也受到再次的確認。相較之下，在體制支持的層次上，迴歸分析的結果則與本文的假設有些許的出入。我們發現，美國與臺灣的民主評價在 2011 年的調查中仍有顯著負向影響，且愛國主義也有顯著的正向調節作用，但在 2015 年的調查資料中則無論是他國民主評價或與愛國／民族主義的交互作用項，均沒有任何顯著影響，而在 2019 年的資料中，美國的民主評價更是與體制支持程度呈正向相關，而愛國／民族主義也轉成正向調節效果。最後，我們在表 10 中則呈現以中國大陸民眾對本國民主評價作為自變數的迴歸分析，我們發現，對中國大陸的民主評價越高，則體制支持程度越高，且自由民主價值越低。然而，在表 10 的模型中，愛國／民族主義並沒有增強中國大陸民主評價的反民主支持效果，反而使人們增加對民主的支持。

總體來說，以個別民主評價作為研究自變數時，在多數情形下，結果與本文的假設相符，然而在越近期的調查資料中，有越多與本文假設不一致的情況，如 2019 年針對體制支持的回歸看似與本文的假設完全相反，此外，在交互作用變數的表現上，表 10 的結果也看似不如我們的預期。對此，我們提出兩個討論的方向。首先，我們從圖 2 與圖 3 中可以發現，隨著美中臺三方關係的日益緊張與中國大陸內部的重新威權化，人們的體制支持與自由民主價值水平並未有太多改變，但對美國與臺灣的評價，則隨著衝突的升級與交流的冷卻，使得美國與臺灣公共外交的效果減弱，因此，民主

表 8 迴歸模型：以美國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美國民主評價	-0.096*** (0.034)	0.071 (0.050)	0.121** (0.058)	0.466*** (0.067)	0.531*** (0.073)	0.376*** (0.089)
愛國 / 民族主義	0.079 (0.132)	0.437*** (0.073)	0.486*** (0.085)	1.114*** (0.199)	0.647*** (0.099)	0.383*** (0.135)
愛國 / 民族主義 × 美國民主評價	0.051** (0.020)	-0.013 (0.012)	-0.024* (0.014)	-0.188*** (0.029)	-0.106*** (0.018)	-0.061*** (0.020)
中央治理評價	0.844*** (0.123)	0.441*** (0.095)	0.513*** (0.081)	0.593*** (0.223)	0.322** (0.156)	0.613*** (0.166)
地方治理評價	0.310*** (0.099)	0.390*** (0.081)	0.314*** (0.070)	-0.283** (0.117)	-0.255** (0.119)	-0.092 (0.110)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306*** (0.055)	0.254*** (0.060)	0.136*** (0.046)	-0.098 (0.093)	-0.219*** (0.056)	-0.133 (0.088)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3* (0.055)	0.179*** (0.052)	0.205*** (0.039)	0.310*** (0.096)	0.312*** (0.078)	0.218** (0.094)
家庭經濟狀況	0.082* (0.044)	0.066*** (0.023)	0.069** (0.031)	0.215*** (0.058)	0.064 (0.063)	0.133** (0.052)
OTA 價值	0.100*** (0.026)	0.161*** (0.021)	0.134*** (0.033)	-0.536*** (0.044)	-0.338*** (0.055)	-0.288*** (0.064)
女性	-0.175** (0.086)	-0.136*** (0.040)	-0.189*** (0.045)	-0.349*** (0.076)	-0.117 (0.074)	-0.416*** (0.063)
教育程度	0.029 (0.038)	0.173*** (0.027)	0.181*** (0.023)	0.504*** (0.130)	0.748*** (0.062)	0.487*** (0.056)
年齡群體 = 79 後	-0.059 (0.063)	-0.027 (0.035)	0.018 (0.054)	0.484*** (0.111)	0.694*** (0.111)	0.347*** (0.074)
年齡群體 = 90 後	0.178 (0.114)	0.219** (0.091)	0.034 (0.064)	1.129*** (0.186)	0.581*** (0.105)	0.444*** (0.100)
鄉村戶口	0.018 (0.088)	0.024 (0.060)	-0.020 (0.069)	-0.479*** (0.133)	-0.367*** (0.113)	-0.033 (0.086)
黨員	0.194*** (0.054)	0.084* (0.043)	0.080* (0.043)	0.216** (0.102)	0.267*** (0.095)	0.086 (0.065)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9 迴歸模型：以臺灣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臺灣民主評價	-0.075* (0.039)	-0.027 (0.050)	-0.008 (0.048)	0.422*** (0.066)	0.539*** (0.074)	0.210* (0.117)
愛國／民族主義	0.163 (0.115)	0.273*** (0.069)	0.327*** (0.062)	0.945*** (0.270)	0.615*** (0.120)	0.194 (0.182)
愛國／民族主義 × 臺灣民主評價	0.040** (0.018)	0.013 (0.012)	0.002 (0.011)	-0.172*** (0.039)	-0.109*** (0.016)	-0.033 (0.027)
中央治理評價	0.844*** (0.123)	0.434*** (0.094)	0.520*** (0.084)	0.595*** (0.224)	0.313** (0.149)	0.630*** (0.165)
地方治理評價	0.313*** (0.098)	0.386*** (0.081)	0.312*** (0.070)	-0.306** (0.128)	-0.246** (0.122)	-0.103 (0.112)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307*** (0.054)	0.250*** (0.059)	0.137*** (0.046)	-0.117 (0.099)	-0.240*** (0.058)	-0.135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105* (0.056)	0.182*** (0.050)	0.206*** (0.040)	0.292*** (0.099)	0.331*** (0.078)	0.224** (0.098)
家庭經濟狀況	0.080* (0.044)	0.067*** (0.022)	0.069** (0.031)	0.226*** (0.055)	0.082 (0.062)	0.133** (0.052)
OTA 價值	0.101*** (0.025)	0.161*** (0.020)	0.133*** (0.033)	-0.549*** (0.043)	-0.333*** (0.051)	-0.293*** (0.064)
女性	-0.174** (0.087)	-0.138*** (0.040)	-0.190*** (0.045)	-0.353*** (0.080)	-0.115* (0.070)	-0.431*** (0.063)
教育程度	0.023 (0.038)	0.178*** (0.027)	0.186*** (0.022)	0.558*** (0.119)	0.767*** (0.062)	0.509*** (0.056)
年齡群體 = 79 後	-0.063 (0.063)	-0.018 (0.034)	0.023 (0.055)	0.519*** (0.116)	0.712*** (0.107)	0.373*** (0.076)
年齡群體 = 90 後	0.174 (0.115)	0.236** (0.092)	0.042 (0.063)	1.195*** (0.202)	0.645*** (0.098)	0.483*** (0.099)
鄉村戶口	0.021 (0.089)	0.018 (0.060)	-0.019 (0.070)	-0.495*** (0.132)	-0.382*** (0.110)	-0.032 (0.088)
黨員	0.198*** (0.054)	0.085* (0.044)	0.076* (0.043)	0.189* (0.103)	0.267*** (0.095)	0.079 (0.063)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表 10 迴歸模型：以中國大陸民主評價為主要自變數

	(1) 體制支持	(2) 體制支持	(3) 體制支持	(4) LDV	(5) LDV	(6) LDV
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0.228*** (0.027)	0.215*** (0.031)	0.187*** (0.047)	-0.188*** (0.048)	-0.177** (0.081)	-0.048 (0.117)
愛國 / 民族主義	0.792*** (0.101)	0.458*** (0.046)	0.366*** (0.071)	-0.609*** (0.146)	-0.151 (0.113)	-0.107 (0.166)
愛國 / 民族主義 × 中國大陸民主評價	-0.072*** (0.016)	-0.025*** (0.007)	-0.009 (0.010)	0.081*** (0.022)	0.021 (0.019)	0.016 (0.025)
中央治理評價	0.770*** (0.118)	0.231** (0.090)	0.286*** (0.075)	0.657*** (0.225)	0.567*** (0.166)	0.621*** (0.155)
地方治理評價	0.257*** (0.098)	0.322*** (0.085)	0.240*** (0.072)	-0.288** (0.145)	-0.191* (0.114)	-0.102 (0.115)
國內經濟表現評價	0.228*** (0.056)	0.213*** (0.058)	0.094* (0.048)	-0.085 (0.098)	-0.215*** (0.061)	-0.137 (0.087)
每日閱讀政治新聞	0.088* (0.052)	0.179*** (0.048)	0.174*** (0.034)	0.343*** (0.105)	0.358*** (0.077)	0.207** (0.099)
家庭經濟狀況	0.063 (0.045)	0.070*** (0.021)	0.067** (0.029)	0.246*** (0.055)	0.080 (0.062)	0.133** (0.053)
OTA 價值	0.090*** (0.026)	0.159*** (0.019)	0.133*** (0.034)	-0.551*** (0.043)	-0.331*** (0.051)	-0.293*** (0.064)
女性	-0.176** (0.079)	-0.144*** (0.038)	-0.190*** (0.046)	-0.350*** (0.072)	-0.152** (0.071)	-0.422*** (0.063)
教育程度	0.045 (0.044)	0.198*** (0.028)	0.186*** (0.022)	0.563*** (0.127)	0.769*** (0.059)	0.515*** (0.057)
年齡群體 = 79 後	-0.036 (0.061)	0.012 (0.035)	0.025 (0.055)	0.504*** (0.117)	0.719*** (0.107)	0.378*** (0.076)
年齡群體 = 90 後	0.141 (0.122)	0.213** (0.090)	0.043 (0.066)	1.191*** (0.199)	0.717*** (0.105)	0.487*** (0.098)
鄉村戶口	-0.006 (0.083)	0.005 (0.059)	-0.038 (0.068)	-0.525*** (0.137)	-0.390*** (0.116)	-0.033 (0.088)
黨員	0.166*** (0.058)	0.050 (0.042)	0.051 (0.041)	0.222** (0.110)	0.311*** (0.092)	0.065 (0.066)
樣本數	3472	4010	4928	3472	4010	4928

資料來源：Chu et al. (2020)

示範效果的逐步下降，實然是符合國際政治脈絡的走向。而在愛國與民族主義的調節作用上，則更有可能是因為 2015 年之後，愛國／民族主義情緒節節上升，以致於在個體層次中，該變數的歧異性快速降低，而導致調節作用的失效。

然而，從表 8 至表 10 的結果中我們也發現，若單純使用對特定國家的民主評價作為自變數，並無法讓我們精確地評估民主國家是否存在「示範」的效果。由於本文使用的是個體層次的調查資料，因此，倘若我們相信「每一受訪者」對「民主」都有一套自己判斷的標準，那麼每一筆調查資料中對本國與他國民主評價的二元體（dyads）便也是基於相同判準下，對兩地做出的民主評價，因此具有可比性。基於作者在正文中理論推導的核心概念之一是人模仿的天性，而人們的模仿過程又是基於「比較」的結果，因此，我們認為在正文中以「評價差異」而非「評價絕對指標」來操作化「民主示範效果」，將會更貼近作者立論的原始動機。

## Differences of Democratic Quality Assessment and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in China:

The Democratic Demonstration Effect and the  
Attenuation Effects of Nationalism and Patriotism\*

*Hsin-che Wu\*\* & Osbern Huang\*\*\**

### Abstract

Why do citizen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upport democracy more than the status quo? Modernization theory, the theory of redistribution, and the culturalist approach all focus on state-level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or on historical legacies. However, in this article, we bring international factors into the discussion and suggest that the “democratic demonstration effect” of global democracies, in addition to the two mechanisms of “coercion” and “competition”, is the key reason behind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wishes of the masses in autocracies to “imitate” democracies. Furthermore, due to greater “soft power” and successful “public diplomacy”, we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superpowers, as well as democracies in neighbouring states, will have a greater chance to stimulate the aspirations for democracy of the citizens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through their own democratic practice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e also believe that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m will weaken the “democracy demonstration effect” on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To illustrate our theory and test our hypothesis, we take Mainland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as cases of authoritarian regimes, democratic

---

\* DOI:10.6166/TJPS.202012\_(86).0002

\*\* Instructor,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E-mail: hsinche.wu@nju.edu.cn

\*\*\*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E-mail: osbern@gmail.com

powers, and democratic neighbours, and analyze three waves of public opinion data conducted in Mainland China in 2011, 2015, and 2019. We show that differences in democratic quality assessment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its democratic counterparts significantly raises people's liberal and democratic values, and reduces their preference for one-party regimes. In addition, we have found that the patriotic and nationalistic sentimen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tends to neutralize the demonstration effec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on popular support for democracy.

**Keywords:** Democratic Support, Soft Power, Patriotism, Nationalism, China Studies